

新视界

NEW VISION

学人访谈

国际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发展 P01

时事观察

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将何去何从 P05

学术论文

国际话语权视角下的中美软实力之争 P08

国关人物

高坂正尧 P25

海外随行记

记忆中的那一抹微笑 P41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编者的话

北方的春天总是迟到，伴着天气的时好时坏，气温的起起伏伏，四月悄然而至。暗沉了一个冬天的世界开始慢慢披上朦胧的色彩，积蓄着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生命力，满怀春暖花开的等待与梦想。走在南开园里，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涌动的活力与朝气：清晨新开湖畔的朗朗书声，夜幕里自习室归来的匆匆身影，男生们飒爽的英姿，女生们悦耳的笑声……一幕幕里，你可以聆听梦想澎湃的声音，感受青春洋溢的美好。

而新一期的《新视界》正是凝聚着编者乃至所有国关师生热情与青春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我们期待引领读者关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舞台，讨论热点时事，把握学界动态，分享学术观点，展望未来，共同进步。忠于“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的承诺，本期《新视界》将带您走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黎教授，听他讲述国际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与发展；从国际话语权视角审视中美软实力之争；探讨委内瑞拉在后查韦斯时代的发展走向；关注多边主义合作，解读名家观点；聚焦“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协同创新”研讨会，掌握写作规范，探寻学术创新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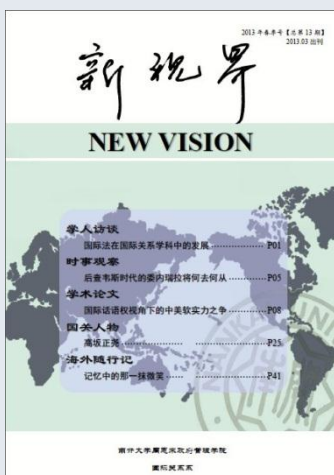
细心品读，您或许会发现，《新视界》一如既往地希望呈现给您国关世界中无限的精彩，与此同时，也不断努力做出新的尝试：“英采飞扬”引入网络讨论环节，为国关师生提供表达观点，碰撞思想火花的平台；院系新闻新增“校外短讯”，搜罗国内主要国关院系新闻，帮助南开国关学子了解学界动态；“读编往来”则独具匠心地推出“最受欢迎的栏目”评选活动，倾听读者心声，了解读者需求，谋求各栏目的完善与发展。

创刊以来，许多“元老级”的编者相继毕业离开，同时也有许多新鲜血液满载热情加入进来。传承不变的，是我们对这个梦的呵护与期盼：在那不计其数的工作邮件中，在那院系讲座活动的第一线，在那精益求精的校对工作里……感谢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感谢读者朋友的温馨陪伴，感谢编辑部每一位成员的辛勤付出。因为你们，2013年的《新视界》将继续往开来，更进一步！

期待叶间初生的新绿，期待一树一树的花开，期待春燕在梁间呢喃，期待在这人间的四月天，《新视界》给您带去鲜活的知识与崭新的视角！

曹 滢

2013年3月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



2013年春季号

【总第13期】

2013.03 出刊

主编: 姜忆楠

本期执行主编: 曹滢

副主编: 董柞壮 郝丽君

吕海 沈琳 孙迪

编辑部成员:

陈一一 程康 郭晓琼

李家胜 李金潼 刘芮宁

刘雨晨 马焱粮 彭紫嫣

任娟 石宇 孙跃

王宝盆 王芳琳 徐芳宇

杨雪 于凯玥 张晓康

赵姝婧 赵政 左锦涛

胡阳阳 李璇 李安琪

李冰莹 宁鹏举 裴瑶

封面设计: 曹滢 刘芮宁

美编: 曹滢

目 录

编者的话 (I)

学人访谈

国际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发展.....王 黎 (1)

时事观察

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将何去何从?李家胜 (5)

学术论文

国际话语权视角下的中美软实力之争.....王亚琪 (8)

书山有路

如何促进多边主义合作.....陈一一 (17)

国关人物

高坂正尧.....王广涛 (25)

他山之石

教学生写“现实生活”: 课堂上的政策文件写作

.....贝蒂娜·杜贝 (30)

聚焦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协同创新”研讨会

会议综述.....杨 娜 (36)

发言集锦.....张耀铭等 (39)

目 录

海外随行记

记忆中的那一抹微笑 蔡永晖 (41)

英采飞扬

线上讨论 王缉思等 (44)

妙笔生花 刘苗苗 (46)

新书架 (一) 吕海 程康 王宝盆 宁鹏举 (48)

院系活动

系内新闻 (51)

校外短讯 (55)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57)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60)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64)

读编往来 (70)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72)

征稿启事 (78)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2010年6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处、秘书处和宣传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国际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发展

——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黎教授

【编者按】1919年,威尔士慈善家戴维斯资助威尔士大学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授,这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在这一时期,国际政治专业的课程设置以国际法和外交史学习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国际法在专业学习中的地位也显得不如战前。时至今日,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中,国际法虽然仍然被一些欧美学校所要求,但却已经不再是主干课程。对此,我们要问:国际法对国际关系学科早期发展的贡献在哪里?当前国际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相对颓势是哪些因素造成的?我们在专业学习时又应当怎样对待国际法?为此,我们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的王黎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他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为我们分析上述问题。

【人物简介】王黎,英国阿伯丁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系。主要从事欧美外交与国际关系,国际法史与国际组织研究。主要著作有《欧洲外交史1494-1925》、《美国外交中的条约与武力》、《跨国视角下的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合著)等。

《新视界》: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主干课程,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

王黎教授(以下简称“王”):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在早期是非常深的,特别是在第一阶段,1919-1945年,因为当时还是欧洲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时期。而作为一个崇尚法制和民主的社会,欧洲国家重视法律的传统思维对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发展影响至深。

为何在“一战”后,研究国际关系要从国际法和外交史开始?简单地讲,一个新学科的出现,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学术背景。我们成立一个全新的学科,不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其他学科中汲取借鉴,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成立一个全球一体化、南南合作的研究所,都不可能离开政治、经济、外交、哲学、思想、

历史、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从这个角度讲,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时候,比较接近的学科是什么?研究国家间关系、外交政策的制定,比较接近的学科是国际法与外交史。

所以国际关系学科最初成立的时候,学科建设主要来自两类学者,一是以诺尔·贝克、曼宁(C. A. W. 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奥本海(Lassa. F. L. Oppenheim)等国际法学出身的学者为代表,另一派是以齐默恩、卡尔、莫瓦特等欧洲外交史或历史学者为代表。所以最初英国几乎所有开设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科的大学,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布里斯托大学、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等,都是在这两个学科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系。他们主要研究为什么战争会爆发,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阻止战争的爆发。但牛津大学和伦敦政经的学者认识到战争的爆发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有经济因素，如果仅称之为国际政治系，未免视角太窄。故仅仅研究战争的原因和过程是不行的，还要研究经济。凯恩斯在此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有战争，还有和平、贸易、人员往来、思想交流，所以“国际关系”更能概括国际政治现实。

总体而言，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着眼点迥异。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一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所以，早期国际法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

《新视界》：更进一步说，国际法对国际关系中一些基本概念如集体安全、国际规范、国际体系等有什么影响？

王：你们说的这些概念实际上最初都源于欧洲，而成熟于美国，但其归根结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国际法概念的影响。很多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思考促成了这一些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比如诺尔·贝克关于集体安全和裁军方面的论述。

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 Robert 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前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著作《裁

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

诺尔·贝克属于以格劳秀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事实上，曼宁、劳特派特等许多其他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基本概念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新视界》：既然如您所言，国际法对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的发展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国际法在整个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又下降了昵?

王: 国际关系学科在成长的早期阶段, 在学科建设上借助的力量只有国际法和外交史, 但是, 为什么国际法的作用慢慢消退呢? 我想这主要还得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美国的因素。二战之后, 现实主义理论思潮在美国出现, 并且成为主流, 这里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汉斯·摩根索说, 大量的犹太难民逃往美国, 他们害怕美国再陷入孤立主义, 他们要让美国感受到, 现在美国是世界霸权, 必须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所以美国需要全球主义, 而非孤立主义。当时摩根索写了一本书, 叫《国际政治》, 也有人翻译成《国家间政治》, 但我认为就是“国际政治”。当时的小标题是, “为权力而搏”。但美国出版社拒绝出版, 怎么办? 他把小标题改成了“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 这样才得以出版。所以, 当时美国的和平主义还是很强的。二战结束后, 出现了冷战, 这验证了卡尔·摩根索的观点, 国家之间不可能长期和谐、实现集体安全, 冲突是本质存在的, 是常态。从1960年代起, 美国社会科学开始了行为主义革命, 科学的研究方法被不断强调和凸显。

第二, 国际现实也让人感觉到国际法很脆弱。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是在一战之后, 那时学者与政治家对国际法是比较看重的。学者从国际法中汲取营养构建国际政治理论, 政治家构建了集体安全框架以维护世界和平。但是, 国际政治的现实并未按照学者和政治家的设想发展, 在 20

世纪的 20-30 年代, 即所谓的“20 年危机期间”, 卡尔撰写并于二战前夕出版了非常重要的著作《二十年危机》, 他在书中非常深刻地批判了理想主义。恰好在那本书出版的同时, 二战爆发了。国际政治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权力和利益是国家最为考虑的因素, 维护世界和平的最重要手段是均势, 而不是国际法。那么二战之后怎么样呢? 二战之后, 我们知道国际结构很快出现了美苏两极格局, 权力平衡、国家利益、国际安全完全高于任何国际法。

第三, 从学科上讲, 国际法本身有两个软肋, 并常常被学者们攻击: 国际法的母法基础在哪里? 通常国内法的基础来自于宪法, 而国际宪法不存在。如果没有国际宪法, 这个法律依据在哪里? 我们现在主要是指《联合国宪章》, 但人们会觉得这很可笑。另外, 谁是执行国际法的机构? 假如一国违反国际法, 谁派警察去执法? 现在没有一个“国际司法部长”, 也没有一个“国际派出所”。所以学法律的人, 特别是学国内法律的人就有一种观点, 即国际法不是法, 因为它缺乏强制执行机制。

《新视界》: 全球化已不可逆, 不少新兴的地区性大国(比如金砖五国)都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美国的战略有所收缩。在此情况下, 国际法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能够起什么积极作用?

王: 正如之前所讲, 国际法和外交史是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必需。全球化是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结构的过程, 而新的国际法法规必然需要。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标准, 那么全球化就绝对是个空话, 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完全脱离无政府状态。

那么说到全球化，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绝非达到修改现存国际秩序的程度。况且，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互不服气和信任，很难形成像英美、北约那样的关系；而作为学术探讨，这几个国家，目前也很难取代由西方国家主导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学术理念。这里我认同约瑟夫·奈在《权力的未来》中说的，“这几个国家各有优点，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文化教育上挑战美国”。不过，国际法还是非常重要的，新兴国家在这方面很难提出新的理念，但还是能够作为一种补充。即便国际法的核心理念来源于欧洲，并由美国扩大，但是肯定有很多观念不能代表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欧美文化的国家。另一方面，现在也有人提到，当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学者们，由于受过美欧的教育，其关于国际关系的理念与西方是一致的。

《新视界》：我们知道，您有着丰富的留学经历，您可否简单比较一下当前中国和西方在国际关系专业中国际法课程的教学？同时，您对国关专业的同学如何学习国际法有什么建议呢？

王：为什么现在欧洲仍然比较接受国际法？欧洲人认为只要你往国际社会这个方向走，或者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叫国际社会的话，那么就有法（即哪里有社会，哪里就有法）。所以如果承认我们今天各国所生存的这个国际体系构成一个国际社会的话，就要有法。但是，美国人不承认或很少用社会（society）这个概念，比如奥巴马他们讲话，都用的是 community（社区），没有什么特别强制的约束，互相之间可以不理睬。为什么他们不用“社会”呢？他们知道一旦接受 society，他们就必须承认甚至遵循国际法。

中国对国际法也是比较认同的。我承认中国政府很尊重国际法，中国政府绝对把国际法作为国家行为的一个准则加以强调。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学科建设还非常弱。你得深入了解所学专业。就历史系的外交史而言，你若是在美国的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学校，就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在政治系，尤其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换句话说，你若是研究某一个领域，你就必须得用这个领域的专业语言来解读，你不能光解读史料。这是在国外，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除此之外，政治科学、外交史也很重要。我个人认为一个学生的知识结构的构建和训练是最重要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学生的学科训练是坚决不能忽视，坚决不能掺假的。学生需要读大量的条约，这对理解一国的思想和理念、理解国家力量的变化、理解国际法有很大帮助。我们所涉及到的集体安全、国际社会、裁军、国际冲突等理念，有很多都离不开国际法。第二，要学习主要国家的国别史、地区史和专史，比如国际关系史、法律史、经济史、政治史等。第三，要有方法论，要有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掌握。如果说谁是学国际关系的，但是对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主权都无法解释，那怎么和别人交流？第四，你得给学生提供语言训练，听说读写都得会。

[整理：李家胜、李 漩、
宁鹏举、裴 瑶、赵姝婧]

[责任编辑：陈一一]

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将何去何从？

李家胜*

2013年3月5日，被称为“反美斗士”、“拉美左翼领导人领袖”、“21世纪的社会主义创造者”的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病逝，结束了他对委内瑞拉14年的统治，这一事件一时间引起国际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对委内瑞拉人民致以最深切的问候。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先后向委内瑞拉发去唁电，称查韦斯是拉美最伟大的领袖。法国总统奥朗德、英国外交大臣黑格、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也纷纷发电表示悲痛。曾被查韦斯大力抨击的美国，则对这一消息传达了积极的信号。奥巴马称：在查韦斯逝世的艰难时刻，美国重申对委内瑞拉的支持，以及对同委内瑞拉政府发展建设性关系的兴趣。那么，查韦斯其人究竟给委内瑞拉带来了什么？查韦斯之后的委内瑞拉，又将在国内政策以及外交政策领域发生怎样的转变呢？

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经济发展滞后，债务负担陡增。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之下，一批拉美国家纷纷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建议，进行了大规模的自由化、私有化运动。但依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药方获得经济发展，是，拉美国家并没有经济药方获得经济发展，距拉大、社会矛盾日背景之下，至1999年，联盟候选人的身份成此后，委内瑞拉开始韦斯时代”。



化、私有化运动。但依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药方获得经济发展，是，拉美国家并没有经济药方获得经济发展，距拉大、社会矛盾日背景之下，至1999年，联盟候选人的身份成此后，委内瑞拉开始韦斯时代”。

在内政方面，查韦斯在经济上积极推动国有化，建立了石油、电信、电力领域的一批国有企业，牢牢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社会政策上，查韦斯致力于缓解贫富差距，积极拉拢底层群众，建立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在政治进程上，查韦斯修改了宪法，先后延长了总统任期并赋予总统的连任权。他将委内瑞拉的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将三分之二多数原则改为简单多数原则；削弱司法独立性，将大法官的人数由20人增至32人。总之，查韦斯通过民主程序获得了权力，并通过总统权力削弱了权力制衡，成为具有强人政治风格的魅力总统。在外交方面，查韦斯掀起“反美大旗”，他曾称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为“魔鬼”，称“魔鬼不在地狱，而在华盛顿”。他加强了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的伊朗、朝鲜的外交关系，支持利比亚、叙利亚，称卡扎菲为反美“烈士”。他积极构建设没有美国参与的拉丁美洲多边制度安排，推动拉美建立南方银行、加入南方共同市场、建立南方电台等等。查韦斯14年的统治，使委内瑞拉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迅速，人均GDP由4105美元升至13657美元，

* 李家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兴趣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作者邮箱：lijishengzai@sina.com。

贫困人口由 50% 下降至 26%，且大大提升了委内瑞拉在拉美、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影响力。但是，查韦斯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也受到很多批评，比如。委内瑞拉的国内通货膨胀率高达 30%，国企腐败严重，依靠石油发展经济的模式不可持续，民主政治进程遭遇危机，外交政策空间被动，等等。

因此，查韦斯逝世后，学界和政策界纷纷在研究委内瑞拉的政策走向。委内瑞拉上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如果重新选举，查韦斯指定的接班人马杜罗可以获得 50% 的选票，而反对派候选人卡普里莱斯有望获得 36% 的选票支持。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查韦斯之后的委内瑞拉势必会发生变化，但是未必会在短时间内改弦更张。这一预测基于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势力格局和民众对领导人的期望值，因为任何一个党派的领导人都要顾及自身政党的能力和国内民众的支持。

社会政策的调整空间有限，因为竞选者必须顾及选民的支持。查韦斯任内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即使是反对派领袖卡普里莱斯上台执政，在短期内，社会政策的调整空间也非常有限。剥夺民众的福利很容易导致社会动荡，这是每一位执政者都必须考虑的；所以，即使执政者要彻底变更制度，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否则将会把国家带入灾难。



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暴露出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即使查韦斯指定的接班人马杜罗接任总统，也一定会尝试调整其国内经济政策。因为马杜罗是一位性格较为温和的领导人，没有查韦斯式的个人魅力，很难承担起拉美左翼领导人的角色；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国内的中产阶级已经对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淡化了总统的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以社会经济阶层为界限的社会裂痕亟需弥合，分散了总统的能量和精力。因此，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变化的空间不大。

在政治进程方面，委内瑞拉很可能会由执政党的长期执政转变为非常典型的精英政党政治，因为查韦斯式的强人政治随着查韦斯的离去而不能长期推行。如果马杜罗当选，他一定会拉拢和整合查韦斯旧部，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力争取政权稳固。如果卡普里莱斯上台，则很有可能推动政治民主化。

在外交政策方面，委内瑞拉随着“反美斗士”的离去，会对美国采取一种比较务实的外交政策。因为委内瑞拉以石油立国，石油出口量的 60% 是销往美国，约为 100 万桶以上。即使在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也没有中断与美国的经贸联系，相反却借助美国的资金、技术发展本国经济。据有关人士分析，查韦斯的确是“反美斗士”，但是他反对的不是整个美国，而是反对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干涉，反对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只要美国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委内瑞拉采取比较务实的对美政策是可以预期的,更何况一个失去了强人总统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更没有理由挑衅美国。查韦斯的离去对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消极作用。拉美再也没有一个领导人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左翼领袖,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进程可能放缓。与拉美在上个世纪末集体向左转不同,查韦斯的离去很可能是拉美模式新一轮反思的契机。

对中委关系而言,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的对华态度不会急剧变化,因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别国人民自主选择领导人,在委内瑞拉的立场和态度相对超然;委内瑞拉的对华政策即使改弦更张,中国政府也很难对这个遥远的邻国做出强烈反应。与中国远隔重洋的委内瑞拉更没有条件和意愿成为反华“急先锋”。中国企业在委内瑞拉拥有大量资产,一个政局动荡或崇尚经济国有化的委内瑞拉使中国企业恐慌,而走向政党政治、相对务实温和的委内瑞拉反而使中国外交以及中国企业带来更高的安全保障和更大的投资选择。

[责任编辑:王芳琳]

概念术语

责任推诿(buck passing)指的是将自己的行为责任归咎于他人或群体的行为。它经常在权力政治中作为一种策略使用,一国将自身的责任归咎于另一国,而这往往导致战争的产生。

最显著的案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法国、纳粹德国和苏联等国之间产生。英国、法国与纳粹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意图祸水东引。而苏联随后也与纳粹德国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让战火重新烧向西方。

[整理:马焜粮 李冰莹 李漩 李安琪]

国际话语权视角下的中美软实力之争

王亚琪*

内容摘要: 软实力特有的运作机制决定了国际话语权在软实力构建中的重要地位。在中美软实力竞争中,美国利用其国际话语霸权建构“中国威胁论”,严重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国际话语权的视角重新审视中美软实力之争。本文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平台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重视话语主体多样性、拓展话语平台,明确国际定位、提升话语自信,变革国际制度、争夺话语平台主导权是增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国际话语权的建立与巩固已成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软实力; 国际话语权; 中美关系

作为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两国对彼此间关系的重要性都有着充分认识。尤其是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则相对衰落,无法独立自主主宰世界。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防止核扩散以及应对恐怖主义与全球气候问题等诸多领域,美国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在此背景下,奥巴马在 2009 年首次访华时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 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也明确提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然而,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两国利益的重合。^①在两国高层不断强调中美建立合作关系重要性的同时,以“重返亚太”为代表,美国却不断防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借助话语霸权,美国建构了“中国威胁论”,异化中国国际形象,阻挠中国崛起。受其影响,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未能使中国的软实力得到相应增强,反而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意图产生疑虑,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可见,在中美软实力竞争中,中国国家形象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不断受到歪曲与误读,这严重制约了中国软实力的发展。

简言之,国际话语权的缺失是中国软实力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下面将重点论述以下三个问题:(1) 软实力与话语权的内在关系;(2) 话语权视角下的中美软实力差距;(3) 如何在竞争中塑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切实提升软实力。

一、国际话语权与软实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国家诉诸武力、经济制裁等强制手段实现自身目标的代价日益高昂。因此,国家对强制性权力的使用越来越少,软性的

* 王亚琪,男,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作者邮箱: andrewyq@foxmail.com。

① 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 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2 页。

话语权的重要突破口。此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立还需要实现两个转变。其一,转变将国际话语权视为“辩护工具”的传统观念,在明确中国国际定位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国际话语权实现和发展国家利益;其二,由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向主导者转变,变被动适应国际制度为主动将自身利益与观念贯彻于国际制度中。惟有如此,中国才能在与美国的软实力竞争中摆脱劣势地位,使软实力成为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

总体而言,中美软实力竞争并非是一种不可调和的“零和博弈”,中国软实力的建设绝不是为了抗衡美国。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存在着相当大的互疑与误解,而只有通过正面的沟通,表明双方的立场、坦陈各自的担忧才能消除这种误解,这也正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刘芮宁]

漫画欣赏

迎蛇年



蛇年到来,朝鲜也玩起了危险的“蛇”——核武器,这条蛇将何去何从?能否被控制?不免令人担心。

[整理:马垚粮 李冰莹 李漩 李安琪]

如何促进多边主义合作

——评《小数目和大数目中的多边主义》

陈一一*

内容摘要: 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多边主义合作, 米尔斯·卡勒强调决定合作是否能够顺利进行的标准并不是参与国家数目的多少, 而在于制度框架的设计。卡勒认为授权、代表、投票三项机制的建构是促进多边主义合作的关键。然而, 尽管卡勒认识到了上述三项机制在多边主义合作中的重要性, 却忽视了三项机制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使得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难以形成。本文将在对卡文进行评述的基础上, 结合《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力图对卡勒的观点做一完善的介绍。

关键词: 代表; 授权; 投票; 《京都议定书》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数量激增。这一时期, 为了使全球性议题在多数国家间达成共识, 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式逐渐兴起。然而, 由于受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和冷战后美国单极独霸格局的影响, 加之南北关系的跌宕起伏, 多边主义的形式往往得不到有效实施, 成功的合作范例更是凤毛麟角。

那么, 如何促进多边主义合作? 对这一问题,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米尔斯·卡勒(Miles Kahler) 在《国际组织》1992 年第 46 期第 3 卷中发表文章《小数目和大数目中的多边主义》, 从制度安排角度对一个成功的多边主义合作应具备的前提做了详细分析。本文将在对卡勒的文章进行分析和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进行多边主义的合作。文章安排如下: 1. 对卡勒文章内容的综述; 2. 对卡勒文章不足的分析; 3. 通过案例进一步探讨多边主义合作的条件。

一、多边主义的合作机制

(一) 多边主义的批评及其发展

卡勒在文中首先探讨了何为多边主义, 在此他引用了约翰·鲁杰(John Ruggie) 的总述, 即: “多边主义是按照一定原则来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形式”。^①同时, 卡勒也强调, 多边主义是“相对双边主义和歧视性安排而言的”。^②在此基础上, 卡勒引出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多边主义的批评。首先, 现实主义者认为多边外交机制终将破灭, 因为大国往往由于丧失行动自由而背离多边主义从而导致多边主义合作失败。^③

其次, 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多数”的存在将会导致多边主义的合作面临难以逾越的障

* 陈一一,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2 级研究生, 联系邮箱 hiroshimayiyi@gmail.com。

① John Gerard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June 1992, p. 568, p. 571, p. 572.

② Miles Kahler,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June 1992, pp. 681.

③ Ibid. p. 682.

其减排压力较小；另一方面，在严格的减排方案施行后，欧洲集团所持有的环保技术可以高价出售，从而获利。2. “工业化的落后者”。这一集团由美国领导，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日本是其重要成员。这一集团的环保技术较低，不赞成对主要工业国进行强制的温室气体减排，因为这无疑会损害这一类国家的经济利益。3. 东欧国家集团。这一集团内部的国家遭遇了严重的污染，但是发展落后经济一直是它们不减排的保护伞。4. 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一直寻求特别保护，它们一方面不愿减排，另外也寻求国际社会对其可能的增排采取容忍态度。^①就此而言，虽然有 149 个国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但各个国家早已明确了自身所属的集团。因此会议文本的谈判主要是在 4 方而非 149 个国家间展开。由此可见，代表机制在此次会议中发挥了重要的“减员”作用。

此次会议中，谈判委员会和技术性委员会对推动议定书的最终形成有重要作用。首先，大会根据温室气体的不同种类成立了专门性的委员会，比如针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二氧化碳评估委员会。这一系列技术性委员会从其专门性视角为参与国提出了多套谈判方案，充分保证了谈判的成效。其次，谈判委员会的设立使议程的进行能够依谈判效果而做出机动性的安排。外交官背景出身的谈判委员会主席劳尔·埃斯特拉达（Raul Estrada）也有丰富的谈判经验与技巧，足以胜任斡旋者的角色。^②最后，会议主席理查德·金里（Richard Kinley）和会议执行秘书扎诺斯·帕兹托（Janos Pasztor）也分别得到了参会国的一致授权进行谈判外的协调和最终文本的修订。^③这种授权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但与代表集团的划分方式相契合，同时也保证了会议的公平性。

最后，在投票系统上，大会采取了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的全体一致投票规则。协商一致主要是保证代表集团内部和代表集团间在减排上达成一致意见；全体一致则是重新把文本从集团层面落实到每一个参与国身上，以国家为单位对最后的文本进行投票^④。从效果上讲，这种投票机制不但给谈判者留下了更多讨论空间，也最广泛地反映了每一个参会国的意愿。从机制的匹配上讲，这一投票系统同时保证了代表机制（代表集团协商一致）和授权机制（参会国全体一致）的运行效果，达到了相互完善的效果。

从《京都议定书》的达成过程来看，投票系统、代表机制和授权机制起到了各司其职又相互保障的作用，从而为多边主义的施行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框架。一方面，这验证了卡勒所提出的三项机制是保障多边主义合作进行的关键；另一方面，这也进一步补充了卡勒的观点：只有这三项机制同时存在并相互匹配地运行时，一个多边主义合作的制度框架才会成形。

[责任编辑：李家胜]

① Kendall W. Stiles, *Case Histor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6, pp.154-155.

② Graciela Chichilnisky and Geoffrey Heal, *Environmental Markets: Equity and Efficien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 p. 198.

③ Bharat H. Desai, *Multilateralism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Legal Status of the Secretaria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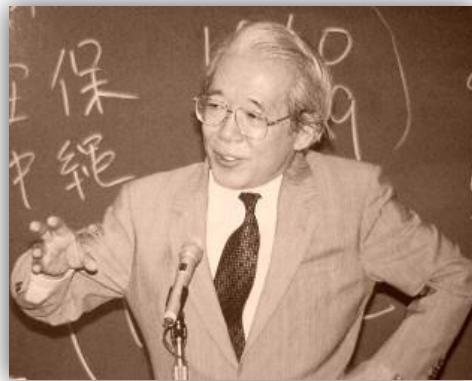
④ 对京都议定书投票系统的描述参见：Farhana Yamin, "The Kyoto Protocol: Origins, Assessm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7, No. 2, 1998, pp. 113-126.

高坂正尧*

【编者按】高坂正尧不是一位典型意义上的学者，而是一位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人物。作为学者，他是日本著名的外交史和国际政治专家；作为公众人物，他是战后日本最著名的意见领袖之一；作为政策智囊，他对日本外交和国际政治形势的洞见曾深深地影响了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首相；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当今日本许多国际政治学者和政界高官都曾是高坂的“门下生”。本文力图以简洁的笔触展示日本已故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的多面人生及其学术思想。

学者简介

高坂正尧，1934年5月8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其父高坂正显是二战期间日本著名的哲学家。1957年大学毕业后，高坂正尧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国际政治和外交史研究。由于其出色的学术功底和对时局的远见卓识，高坂正尧成为当时日本红极一时的意见领袖，并先后担当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三位日本首相的政策智囊，其思想的影响力至今不衰。1996年5月15日，



年仅62岁的高坂正尧病逝，曾是其门下弟子的前原诚司亲往吊唁。著有《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1965年)、《国际政治——恐怖与希望》(1966年)、《政治的思考之复兴》(1972年)、《外交意识——同时代史的考察》(1985年)、《现代的国际政治》(1989年)、《和平与危机的构造——冷战后的国际政治》(1995年)等数十部著作。

一、作为政治学者的高坂

东方文化圈是独立于欧美文化圈的客观存在，东方文明是迥异于欧美文明的古老文明，东方学者也自有其一套独特的看问题的思维与视角。而高坂正尧就恰恰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东方学者，“高坂主义”政治学烙上了东方传统政治学的深刻印记。

(一) 反对理想主义，高扬现实主义

高坂于1934年出生于日本京都，从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一直在京都大学任教。其父是日本著名哲学家、“京都学派”哲学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高坂正显。“京都学派”学者因为在二战期间为日本军国主义大唱赞歌而臭名卓著，特别是高坂正显提出的“世界史哲学”和“近代的超克”，妄图用一种日本军国主义原理来实现其统治世界的目的，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进行学理上的辩护。高坂正尧自然对其父的理论思想持批判态度，这倒不是因

* 作者简介：王广涛，男，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于2012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联系邮箱：wangguang33@163.com。

为日本对外战争的正义与否，而是因为在高坂看来，其父的理念太过于理想主义，以至于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所利用并被其神圣化。

高坂学术的起点恰恰建立在对其父亲的批判之上，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乌托邦），无论这种乌托邦是战前军国主义统治世界的痴心妄想，还是战后和平主义者所描绘的世界大同。他或许是战后第一个敢于自称是现实主义者的日本学者，1963年从哈佛留学归来之后，他便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那篇备受瞩目的《现实主义者的和平论》。在由战后进步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和平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日本学术界，高坂的现实主义立场打破了学术界的沉寂，并由此展开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辩论。当进步知识分子普遍对“日美安保条约”持批判态度的时候，高坂却适时地提出了日美安保条约有利于维持东亚地区秩序的看法。在高坂看来，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理想主义绝对不是和平的充要条件，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有时也可以达至和平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他对战后日本中立主义的批判上。提倡永久中立和非武装中立的学者认为，日本只有中立才能彻底摆脱战争的羁绊，为日本以及东亚带来永久和平。高坂则指出，中立说到底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坂承认非武装中立的道德价值，但是坚称从现实的可能性来看，非武装中立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下是没有可行性的。然而，高坂在批判理想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呼吁持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展开交流对话，因为他认为在中立、核武装等领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总是能找到共同的议题的。例如，高坂在他的书中曾提到“在和理想主义对话的同时，能够使‘现实主义者’的立场发生转变是我私下的一个愿望”。

（二）以史为鉴，汲智取慧

就学术研究而言，高坂拒绝任何体系性（systemic）的理论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他并非志向于成为一名（广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家，甚至对理论持某种怀疑态度。相反，他非常重视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性智慧，故历史性的“考察”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高坂有意识地同美国政治学特别是战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动向保持距离，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并非体系性的知识，而是一种经验和智慧的产物。高坂拒绝体系性思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对代表美利坚文明的美国社会科学持有的批判性意见。例如，他将美利坚文明称为“组织化的体系”、“系统性的引擎”，认为其本质毋宁说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科学管理法”基础上的，象征着大量生产的体系性、方法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他看来，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说到底还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对外交官而言，汲取古典的智慧、从历史中学习是当务之急，机械化、管理科学化的美国社会科学不能提供这类分析视角。不过，随着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国际认可度日益提高，高坂的这一观点也不断遭到批判。高坂门下的学生相继赴美研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一种对高坂政治学的对抗与发展。

二、作为意见领袖的高坂

高坂不仅是一位国际政治学者，同时还是一位政论家（时事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说，

高坂之所以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并不仅仅因其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更是因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对时局的真知灼见。

高坂首次为公众所关注，始于他 28 岁那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现实主义者的和平论》，该文一经出版立刻在日本掀起了关于保守和进步的辩论，日本的学术界、舆论界也因之对“左与右”划清了界限。自从进入时政评论领域之后，出席演讲以及研讨会等活动便在高坂的学术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称此类活动为“夜摊儿”，对此予以抵制，而把集学术性和专业性于一体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当作自己的本职工作。恰恰相反，高坂把他本应作为本职工作的且具有学术价值的国际政治与外交史研究看作一种兴趣。对他而言，作为“意见领袖”以及“世界观察家”似乎更像是他的本职工作。

其实这倒不是个人的偏好所致，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或多或少都在承担着这一职责。战后的日本，甚至直到最近，外交问题一直都是争论最大的焦点之一。日本国际政治学者们喜欢也好、讨厌也罢，都要在这场争论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其背景前提是，学者们普遍具有一种知识分子应该对日本政治负责的精英意识，而且，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学者们继续迂回式地经营学术了，反而是众多十分紧急的现实问题等待学者们提供政策建言。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进步知识分子，还是保守知识分子，其认识并无二致。

例如，在《宰相吉田茂》一书中，高坂一改过往学者、舆论界对吉田茂的否定性评价，从正面、积极的意义上肯定了吉田茂为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左翼知识分子批评吉田的“日美安保条约”，认为这会将日本重新引入战争的漩涡；右翼修正主义者则认为日本在日美安保条约中的地位过于从属、过于低下，日本应该积极谋求重整军备，而不应拘泥于“小规模、轻武装”的安保政策。高坂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吉田茂是典型的“商人型政治家”，而战后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复兴经济，吉田以宪法九条为理由拒绝了美国（包括日本右翼）提出的应让日本重整军备的要求，同时他又以美国对日本进行军事保护为契机，为日本快速发展经济争取了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高坂由此认为宪法九条和“日美安保条约”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不是对日本的束缚。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曾经说过，“通商的天然结果是和平”，吉田也曾经指出“欠债”是国家维系永久关系的必要机制，高坂据此将吉田定义为“商人型政治家”，这与高坂后来提出的“海洋国家构想”如出一辙。高坂认为战后日本的生存之道是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与他国进行贸易，以通商大国（贸易大国）的姿态回归并屹立于国际社会。作为商人型政治家的吉田茂恰恰为战后日本的发展描绘了这样的蓝图。

高坂对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而这些见解至今仍具有启发性。例如，在美国对日本的“朝鲜战争特需”繁荣结束之后，日本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这种特需繁荣只是昙花一现，日本经济终将恢复到战前的萧条境地，然而高坂却指出，三年时间的特需繁荣刚刚合适，日本在渡过了 1954 年艰难的调整期之后，便开始走上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但如果继续依赖这种特需的话，这种经济高速增长或许不可能实现。

同样道理，在谈到中日关系中断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时，高坂指出正是由于战后日本失去了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市场，而不得不依赖于美国这一贸易对象国，才迫使日本改变战前依赖殖民地的贸易政策；同时日本要扩大出口，就需要制造出与美国相比更具有竞争力的商品，这在客观上也迫使日本投身于技术创新，并以高端产品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三、作为政策智囊的高坂

高坂在日本政论界的意见领袖地位，以及他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深知洞见，使得他受到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首相的青睐，并先后成为这些首相任内的重要智囊。

据佐藤荣作的秘书楠田实回忆，佐藤与高坂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佐藤内阁时期的许多外交政策甚至国内政策（如环境政策）都直接受到高坂政策建言的启发。另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佐藤荣作撰写诺贝尔奖获奖演讲词时也向高坂征求了许多意见。

大平正芳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曾设立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研究组”，虽然其研究代表是猪木正道（高坂在京都大学的导师），然而实际撰写报告以及对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做出实际解释的却是高坂正尧。高坂指出，随着石油危机、公害、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的出现，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也应该需要重新定义，并强调新出台的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不仅要确保日本在军事上的安全，同时也要确保日本在外交、经济、能源、粮食以及文化等领域的综合安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最具有战略眼光的安全保障战略，而高坂在其中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

在中曾根康弘内阁时期，高坂的见解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安保政策。例如，1983年中曾根首相设立了私人咨询机构——和平问题研究会，高坂担任会长。在任期间，高坂曾向中曾根建言，日本应该适时修改防卫预算不得超过 GNP 的 1% 的标准。最终，1987 年日本防卫预算打破了占 GNP 的 1% 的禁区。从某种意义上说，颇为世人诟病的“破 GNP1%”的“始作俑者”就是高坂正尧。

四、作为大学教授的高坂

在这里，重新回到高坂的真正职业——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培养人才是教授之天职，在这一点上高坂也不例外。

高坂门下的大批学生如今都已经成为日本国际政治学界执牛耳的人物，如中西宽（京都大学教授、现任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国际政治学）、中西辉政（京都大学教授，国际政治学）、户部良一（防卫大学教授，日本外交史）、田所昌幸（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坂元一哉（大阪大学教授，日本外交史）、益田实（立命馆大学教授，欧洲外交史）等。另外，前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曾任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也曾直接受教于高坂正尧在京都大学开设的国际政治课程。如今，高坂学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当今日本政府的重要政策智囊，他们接过高坂衣钵，继续在日本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

发挥重要影响。

此外,高坂的门下生也有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政界,例如日本民主党的重要人物、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以及现任日本驻华公使垂秀夫(曾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都是在高坂的鼓励下走上政治家和外交官的道路的。从这一点来看,高坂正尧不仅给日本政治学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也为战后日本保守外交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高坂培养这批精英学者和政治家却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从理念上,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学者和政治家能够为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责任编辑:李金潼]

· · · · · 布朗大学 · · · · ·

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是世界闻名的美国“常青藤联盟”成员之一。1764年刚创建之初叫罗德岛学院。1804年,罗德岛学院得到了来自尼古拉斯·布朗的5000美元捐助,使得该学院能够设立一个教授席位。同年,为了纪念尼古拉斯·布朗先生对学院的慷慨捐赠,罗德岛学院正式改名为布朗大学。

布朗大学入学竞争极为激烈,本科生入学率为9.5%,这是全美所有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中列于第六低的接受率。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布朗大学在相当多的领域展开了积极、创新的研究,在美国学术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布朗大学较强的专业不胜枚举,比较出色的有历史、地质、宗教、比较文学、古典文学、现代语言及英文写作等,在美国高校中享有较高知名度。从这些学科领域中毕业出来的高学历学生,后来大多成为美国学术界和科技界的精英力量。

布朗大学似乎与总统的儿女特别有缘,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小约翰·肯尼迪,卡特总统的女儿艾美·卡特,哥伦比亚现任总统桑托斯的女儿,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大学时光。就连克林顿总统唯一的女儿切尔西,也一度被媒体盛传要去布朗大学读书(切尔西在左挑右选之后,终于去了有“西部常春藤”之称的斯坦福大学)。

[整理:马焱粮 李冰莹 李漩 李安琪]

教学生写“现实生活”：课堂上的政策文件写作

贝蒂娜·杜贝*

内容摘要：政治科学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常常只学会了学术写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将来都会愿意从事学术工作。在他们就业后，常常并不具备潜在雇主所要求的写作能力，因而不得不匆忙学习。在课堂上，模拟协作政策写作的过程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获取这些技能的机会，而且帮助他们把课堂上的理论和“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这篇文章运用政策文件写作模拟的案例，阐释了如何进行政策写作以应对来自外交政策制定领域的挑战，从而使同学们掌握政策制定理论、政策实际应用以及政策文件写作的实用技能。

大学本科阶段关于外交政策制定与谈判的教学，通常注重为学生提供对这些过程的理论认识。本文认为，将模拟方式引入到外交政策课程中，可以充实学生们在多个方面的课堂经验。在学习中以理论为主，辅之以政策写作练习，不仅能够使学生们切实理解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谈判的流程，加深对课程中理论部分的理解，同时更能获得宝贵的政策写作技巧。这样的能力，正是许多政治学专业毕业生的雇主们特别需求而在课堂上少有教学的。

为什么要加入模拟训练？

众所周知，大多数政治学专业毕业生不会继续进行学术方面的工作。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数据（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显示，超过60%的政治学毕业生为美国联邦政府工作，其余的则希望为国际组织、智囊团、政治咨询机构、游说团体或是当地公共管理事业效力。所有这些领域中所需要的写作技巧，与学生在多年学习中学到的论文写作模式并不相同。此外，并非所有学生都会于在校期间完成他们在实习机构的实习，尤其当许多工作没有报酬的时候。在教授学生这些受欢迎的写作技巧时，彭诺克（Pennock）等学者提出将政策文件的写作引入到课堂中。

由于不能对公共机构的运作有基于自身的深入了解，许多学生仅仅接触过政策制定与谈判的理论，而从未有过实践。即使是对那些不想追求上述职业能力的学生而言，直接体验政策制定与谈判的过程，对他们深入了解这些过程以及提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也会多有裨益。模拟政策（尤其在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领域）制定过程，在学术文献的教学中有着由来已久的传统。

接下来，我将重点讲述，如何通过让学生仿写关于近期对外政策问题的政策战略文件，

* 贝蒂娜·杜贝（Bettina Trueb）曾经是德国曼海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nnheim, Germany）的一名助理讲师，并曾为德国联邦外交部效力，现任职于欧盟-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基金会（European Union-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Foundation）。她的邮箱是 btrueb@eulacfoundation.org。本文由陈一一、李璇、孙迪、孙跃、王芳琳和赵政翻译与校对。文章来源于 Bettina Trueb, Teaching Students to Write for “Real Life”: Policy Paper Writing in the Classroom,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6, No. 1, January 2013, pp.137-141.

从而使政策写作和对外政策制定这两种形式的模拟与本科生课程相结合。学生们将在三个方面受益于这种练习。第一，他们会了解“理论工具箱”对于分析谈判过程的重要性。第二，他们将了解到课程中提到的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第三，他们将在获得政策写作能力的同时体验协作写作的过程。这篇文章会介绍对写作过程的模拟，以及相关的谈判背景，如政府层面针对新兴国家的战略文件的写作。整个课程以德国为背景进行安排，但其中的观念可以同时用于欧洲乃至美国的不同政策问题和不同国内背景的战略文件上。溯根寻源，这门课程是基于由克伯屈(Kilpatrick)最先主张的“设计教学法”而创设的，它以“现实世界”的问题为基础，以师生互动为模式展开，并由此激发学生们的兴趣，从而使他们掌握有用的解决问题的技能。

学习目标

如上所述，这门课主要想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 向学生们介绍当前事务中的一个议题：新兴国家的崛起
- 使学生们熟悉对外政策制定和分析的相关理论
- 向学生们介绍有关谈判、协商以及官僚政治的相关理论
- 使学生们熟悉有关合作政策理论的写作
- 通过模拟会议强化学生们对理论的掌控力
- 向学生们介绍政策写作的技巧并为他们提供获得一手经验的机会

对外政策战略文件

对外政策战略文件概述了某公共机构或政府在某议题上的立场与策略。一部分这类文件聚焦于政策领域，如发展政策、防御政策或经济政策，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战略部门的文件即属此类；另一些文件实际上带有地域特点，往往聚焦于特定区域，比如德国最近颁布的对拉美的政策文件；还有一部分文件既包含特别的政策领域，也涉及地域性政策目标。此外，战略文件既有可公开的，也有机密级的。依据文件涉及的议题及其机密性，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到某份文件面对的不同受众和执行战略。另外，涉及的机构和部门越多，文件的写作过程也就越复杂。因为这些机构和部门不但要就政策文件的内容协商出一个共同的立场，还需要在合作写作过程中面对来自不合作者的刁难。因此，政策战略文件是这门课程的理想的基础性训练，它既可以教会学生谈判和协商的过程，也能够使学生熟悉政策过程的写作。

在进行这项计划之前，指导教师需要为政策文件写作甄选出一些合适的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文件议题是被假设出来的，或者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因为这样能防止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只是简单的复制已有文件（不过，现有的文件有助于学生熟悉政策战略文件中的一些相关概念）。除此之外，指导教师还需要选择与政治相关的主题，这样才能保证并维持学生们的兴趣，同时也确保了模拟训练能够成功。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选择以德国对新兴国家的政策为题写一份公共战略文件。所谓的新兴国家，主要包括“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

和中国), 和诸如印尼、南非、墨西哥及阿根廷等全球地位日渐上升的国家。当美国与欧洲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挣扎时, 这些国家开始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崭露头角。而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 那些包含新兴国家的多边主义模式(如 G20 等) 也愈发显得重要。此外, 在诸如联合国之类的论坛中, 新兴国家也显得更为自信, 因为它们“老牌强国”在执行计划时不可或缺的伙伴。就此而言, 北方的工业国需要重新配置它们与这些新兴政治经济力量间的交往方式。那么, 如何面对中国的兴起? 如何应对巴西在国际舞台上日盛的信心? 如何应对这些议题的战略文件正是当前事务的一个主题。

课程的设立

为了最好地利用这种模拟课程, 我们建议这门课应持续整个学期。课程内容包括十次每周一次、时长 90 分钟的会议, 还有两次每次时长为三个小时、分别被安排在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的不同部门间的模拟对话会议。在上完模拟课程后的一周会停课一次, 从而给同学们时间来完成写作任务。表 1 是为期 14 周的课程设立的样例。

表 1: “政策文件写作”课程的时间安排

周次	课程	截止日期
1-4	每周 90 分钟的会议	第 4 周: 部门意见书
5	部门间会话(第一次: 3 小时)	
6	计划实施阶段——无课程	
7-10	每周 90 分钟的会议	第 8 周: 逐渐完成部门政策文件 第 10 周: 形成政策文件的初稿
11	部门间会话(第二次: 3 小时)	
12	计划实施阶段——无课程	
13-14	每周 90 分钟的会议	第 15 周: 政策文件的最终版本

课程伊始, 15 名选课学生被随机分配给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发展部、环保部和农业部。对于部门的选择主要取决于需要完成的论文主题以及学生的数量。每个小组由 2-4 名同学组成, 这主要取决于各部门的工作量以及谈判力。例如, 任务量最大的联邦外交部需要协调不同政府间的外交政策战略, 他将由 4 个同学组成, 而任务量较小的经济部和农业部, 则分别只需要 2 名同学。整个学期内, 学生们必须根据所在部门的角色写作政策文件。曾经有学生在完成其应有的任务之余还自愿设计介绍其所在“部门”的职责的宣传册。这个小册子对于公共政策战略文件是通用的, 并且为学生们展示了他们课题研究的实际成效。为了便于信息交流, 我们在该大学的电子学习平台上为学生们提供了部门的特定论坛, 这个论坛对于其他部门的同学是关闭的, 但是会由他们的指导员进行督管。

每次模拟课程之后, 接下来的部门间会话(3 小时)都致力于根据之前发现的理论对各部门的模拟情况进行评估。此外, 每周的会议有时会留出一部分时间给小组, 来研究不同部

们对文件做出的贡献。没有进行模拟课程的会议主要是用来向同学们介绍以下内容：

- 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
-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兴大国
- 政策过程的写作
- 德国政策文件的形成过程
- 外交政策分析
- 讨价还价理论和谈判理论
- 组织理论和官僚政治模型
- 外交政策中政治家和官僚的相互作用

任务和评分

在这个阶段，学生们需要完成三个写作任务，其中两个由小组共同完成，另一个是单人任务。在第一次模拟课程开始的前一周，每个小组需要完成两页的意见书，概述各自部门在对新兴国家政策中的立场及优先考虑的事项，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促使学生们了解其所代表的部门和课堂主题。文件是“机密”的，意味着它们是不对其他小组公开的。根据文件内容和形式差别，学生们会受到来自教师的反馈意见。第二个小组任务是在第一次模拟课程开始后的两周进行，主要是提交与最终的部门文件有关的文本材料，这些材料都来自于第一次模拟课程和第一个小组任务。（与之前不同，）这次的所有文件会公布给全班同学。同样，学生们也会收到有关内容和形式的反馈意见。

个人任务是在课程最后一天提交简短论文。其中，学生们需要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 根据你的经历，哪些部分会影响文件和谈判的形成过程？为什么？
- 你所在小组的政策文件运用了课堂上讨论过的哪些政策写作理论？

学生们也同样会收到反馈意见。此外，他们在课堂上和模拟课程中的表现也会得到评估。

两个小组任务的反馈可以帮助学生重新思考文件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反复的训练有助于提升他们写作政策文件的能力。当然，老师们最好结合个人的政策文件写作经历，否则，他们需要提前熟悉不同类型的政府文件的内容和形式。

模拟课程和文本制作

为了帮助学生了解写作和谈判的整个过程，模拟课程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写作课程，学生们将两个小组任务的材料合成最后的系统文件。这一部分主要由部门职责定位文件以及后续其他文本训练组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老师们需要事先假设一个中央政权，以证明这些文件的合法性。正如上文中提到的，中央政权是德国联邦部门。而在美国的政府文件中，这些中央政权可能是国务秘书办公室或白宫的其他部门。

第二部分是几个部门间会议，其目的是来讨论政策文件的几个主要方面。学生可以由此获得第一手的谈判经验并且开始领会理论性会议所包含的内部机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文

件对照实践，这个可能要花数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为了使学生对这次模拟参与（的效果）最大化，他们在会议上应穿着得体（职业装）。此外，还应选择合适的会议室以使得模拟尽可能远离教室环境。带有圆桌的会议室是恰当的选择，并且这容易在大多数机构实现。协调机构为了更好地组织这次会议，需要准备投影仪以及笔记本电脑。

根据课程规划，第一部分将花费一个月时间。到了这时，学生已经完成了意见书并且熟悉了全球背景下的新兴国家以及德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这两个话题。他们还参加了一个可作为分析框架的外交政策分析会议。然而，他们还没有涉及到进一步的理论。因此，很多学生在第一轮的谈判是白纸一张，他们获得了参与谈判的机会但是却没意识到谈判的策略和机制。这之后产生的“啊哈”效应就是当学生们真正学习一个理论时发现自己已经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实施了该理论。

第一阶段的会议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 由协调机构（此处是联邦外交部）介绍政策挑战
- 核心问题被包含到在战略文件中
- 政策战略文件的结构

这些问题旨在促进各部门组织对各自决议的熟悉程度以及讨论的提出。会议的议程是由联邦外交部小组在导师的监督之下准备的，并且该议程在会议一周前已经通知给全班的成员。联邦外交部小组还负责主持会议和做记录——给它设置议程的权力以发挥其优势，适当记录学生对于会议的评价。导师会带领着外交部团队来处理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话题，例如解决在政策文件中应该包含哪些新兴国家的问题。此外，各部门也必须将他们想要处理的问题和应负的责任描述出来。由于机构之间权限的重叠，学生们必须进行协商以明确外交部、发展部门和环境部门各自的权力以确定在各个外交问题中，谁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在此期间，学生们逐渐“获得”他们的部长级职位，并且在参与有争议的讨论时利用协商和讨价还价的技术，例如“申明价值”——通过诸如“我们的部长坚持这一点，我们没有权力让步”的论调限制自己的权力——来提升谈判力。

第一次模拟会议之后，一个初步的文件大纲和任务分配形成，各机构小组对文件亦有贡献。然后，这些材料就被外交部小组编辑形成文件的第一次手稿，这一编辑任务在第二轮模拟会议开始前一周截止。文件被分发到全班成员手中以便在第二轮模拟会议中讨论。外交部小组从导师那里得到全面的反馈。

第二轮模拟会议发生在这学期的第二个月，准备和组织（过程）与第一次大会相同。大会的议程项目包括如下内容：

- 介绍外交部的第一份草案
- 每个部门对其文本贡献进行附加说明
- 讨论第一份草案，删除重叠部分，使文本质量得以提升

- 讨论引言和结尾段落，由外交部成员对其进行编译并经过全部部门批准
- 讨论文本的布局，由负责这项任务的学生准备

由于第二次会议是为展示协作写作过程而设计的，学生们经历的是关于政策写作主题方面的内容，这在课上曾有涉及。对于草案进行的深层次讨论会产生额外效果，因为不同的学生记住了在写作进程中应该注意的不同方面，并在会上进行交流。第二次模拟大会结束后，第一份草案由外交部进行修正，并被递交到其他部门做进一步的完善。在将草案交给导师之前，学生还要以联邦总理的身份评论和批准最终的版本。

对模拟大会的分析

每一次模拟大会结束后，下次课的部分时间就用来对大会进行评估。在导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在评估过程中回顾他们自己或其他同学所用到的谈判技巧以及会议的结构设置。协调机构怎样利用好议程设置权力？当权限重叠时会发生什么？各个机构的首要职责是什么？它们如何调节会议进程？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通过思考这些问题，学生们可以将课上的理论与实际行为联系起来。此外，在接下来的理论讲习会上，导师会重提模拟大会的一些情况作为结合理论与实例的例子，使课堂的现实体验与抽象理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总结

这项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学到有用的技能，对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活动中涵盖的理论使他们可以有效温习，并运用这些理论对谈判和决策过程进行学理分析。总的来说，课程评估表明，在学期初指定的学习目标成功完成了。

通过将理论讲习会与两种形式的模拟——跨部门协商和政策战略文件写作——联系起来，导师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以满足对会谈进程进行分析的要求，同时也使他们具备了一些课堂上学不到而潜在雇主所需要的技能。

[责任编辑：孙迪]

【编者按】2012年12月1日,由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和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周恩来论坛”之名刊系列——“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协同创新”高端研讨会在省身楼一楼报告厅举行,众多国内知名社会科学杂志的主编或编辑参与了会议。

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与会嘉宾围绕高水平学术期刊与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协同创新、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与高水平学术期刊选题导向、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等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与讨论,分享了工作中的心得体会。本期《新视界》将与您一起聚焦此次创新研讨会。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协同创新” 研讨会会议综述

杨 娜*

2012年12月1日,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和南开大学研究生院主办的“周恩来论坛”之名刊系列——“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协同创新”高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新华文摘》、《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等20家权威学术期刊的总编或主编参加了此次盛会。与会总编或主编就“高水平学术期刊与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协同创新”、“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定位”、“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与高水平学术期刊选题导向”和“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者倡议加强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水平学术期刊的交流与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形势下高校社会科学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和路径。

(一) 高水平学术期刊与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协同创新。名刊是高水平学术成果展示和高层次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高校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而学术期刊则是在研究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平台,研究不论用什么过程和方法,最终都是要有成果的,如能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则是学术研究最佳表现方式之一。大学、大刊、学者、学刊组成了学术研究的命运共同体。与会者就如何办好高水平学术期刊、如何协调学术期刊与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创办优秀学术期刊必须达到三个要求。第一,期刊编者要肩负使命、铭记职责,严把质量关,兼具时代性,在保持期刊的品质与风格的同时,突出刊物的适用性与可读性,进而提高期刊的学术创新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引领学术潮流。编者要敢于扶植新人,为青年学者搭建成长平台,反对论资排辈和以人定文。第二,学术研究应当突出问题意识,敢于提出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准研究方向,采取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 作者简介:杨娜,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努力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学术独立性,大力倡导学术的人文情怀,鼓励学术批评。第三,期刊是学者的精神家园,创造健康的社会氛围和坚守学术精神是期刊与学术界的共同职责,学者与编辑不仅仅是书写历史和呈现历史,还应创造历史。

与会总编或主编从编辑的视角提出问题与建议。虽然期刊接受的投稿甚多,但仍然存在缺少好稿源的现象,今后应建立杂志与读者的沟通机制,加强编辑与审稿人、编辑与编辑、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知。在相互间高度认知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准确的切入点,寻找交流的平台和沟通方式,进而想办法将沟通交流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东西,具体方式有课题合作、开放一些主题研讨会、个别与高端作者交流、主编们到高校指导研究生以及对论文的修改和完善,在某个或某些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时通过共同的机体发声才能形成较大的学

术影响。除此之外,学术创
新并非简单应当以平稳
的心态在尊重
学科发展规
律的基础上提
出新观点,学
者要“透过问
题看本质”,
分析问题要深
刻;学生要注
重基本理论的
积淀,静心做
好基础理论研
究,切忌浮躁



术影响。除此
新并非简单
应当以平稳
学科发展规
出新观点,学
题看本质”,
刻;学生要注
积淀,静心做
研究,切忌浮躁

追求文章数量,要有自己的风格与专业方向。一篇能够进入编辑视线的“好文章”需要提出新问题、提供新观点或新方法,退而求其次也要采用新材料,但不能因为急于寻找新问题而不辨真伪,抓准真问题才能有好的切入点。在阐述观点或分析材料的过程中,作者应注意文章的逻辑关系和结构层次,要以平稳的心态逐层深入研究,同时语言表述要规范、准确、流畅。

(二)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定位。学术期刊要长久保持高端就必须恰当定位,保持自己的发展特色,才能进一步提高刊物水平、增强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乃至国际竞争力,不断吸引更多不同专业或不同需求的优秀作者和读者。建设高水平学术期刊是否需要分工以及如何分工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当前的学术期刊越来越专业化,但宏观层面的整体性研究与微观层面的具体研究都十分必要。专业期刊应该鼓励通则研究、案例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突出专业性和深入性;综合类期刊则要寻找真正具有宏观价值的整体研究,侧重全面性和归纳性,强调思想性、整体性和问题意识。学术研究要处理好学理性与现实性的问题,研究不应为了迎合自己的学科,而把问题削足适履,学术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非塑造学科,学术期刊要在追求理论探讨与分析现实问题之间、定性与定量研究之间、长远战略与当前政策之间把握平衡。为了拉近学术界与学术期刊的关系,期刊还应注重编辑的转型,在学术产品生产的

过程中构建读者与学者之间的平台和桥梁,学术编辑要具备战略性眼光和学科敏感性,要由单一处理稿件转变为参与文章创作与讨论,帮助学者更深入的了解期刊的定位,从而促进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刊物的特色更紧密的结合。

(三) 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与高水平学术期刊的选题导向。由于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定位不同,它们在选稿时就有不同的侧重点和选题导向,学者只有熟悉期刊的选题导向才能将文章投给与自已研究主题相契合的刊物。首先,学者与学生除了写出好文章之外,也要了解各期刊的特色。有些杂志淡化学术,偏重热点问题与政策分析,在选题导向上强调动态性、前瞻性、前沿性、战略性、政策性和理论性。动态性看重第一手新材料;前瞻性要求预估事件的未来影响和政策的长期效果;前沿性要求作者选题“与时俱进”,及时把握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焦点;战略性要“登高望远”,从大处入手掌控全局;政策性要求“对症下药”,针对具体问题找出应对措施;理论性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事件背后的规律。其次,选题应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断尝试拓展。选题的方向和定位也应随形势的变化而调整,顺应主流学术界关注的命题和理论的发展潮流。以国际关系期刊为例,有与会者指出,从事欧洲研究的学者,应全面深入的剖析欧洲的变化,密切跟踪它的转型及其对世界和中国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对于判断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中欧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未来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会上,关注亚太问题的期刊,提出应以中国为本位,从全球视角出发讨论亚太地区的国际问题,强调东亚国家的行为与崛起的中国之间的互动关联。最后,选题虽然要有重点鼓励的研究方向,但对编辑的要求是,在观点和立场上应当保持中立,不能带有个人偏好。

(四) 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与会的总编或主编以学术期刊编审的身份向广大师生分享了如何写出高水平学术论文的经验。文章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感,既回顾过去又涉及当前;运用多样的研究方法,将结论置于经验材料和数据统计之上;分辨政策分析与学术讨论,在现有材料基础上提出并解决问题;研究的目的是影响政策过程,而是要启发民智、与大众分享知识;将一些具体问题做适当的延伸,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被收录和引用的好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要把文章的贡献说清楚,文献的脉络清晰,引用文献必须是自己阅读过的,尤其是使用外文资料需谨慎,必须通读文献全文,不要断章取义。只要能够抓住主要问题,严谨的论证,坚持认真写作的态度,保证格式规范,投稿的论文就可能有进入匿名评审环节的机会。匿名评审是论文能否被录用、保证杂志质量的重要环节。论文的作者应当积极投稿,不必在乎结果,即使论文经过匿名评审并未通过,由于评审都是学术界的权威或该领域的专家,作者至少收获了他们的宝贵评价和建议,而这正是论文进一步完善的依据,有助于作者发现之前忽略的问题,在正确修改意见的指导下反复修改论文为下一次投稿打下坚实的基础。

高水平学术期刊研讨会发言集锦*

张耀铭 (《新华文摘》原总编辑、编审):

创办优秀学术期刊在于期刊编者肩负使命、铭记职责,透过内容的价值营造和学术语言的表达,体现期刊的品质、风格、境界和情怀,形成期刊的学术创新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优秀期刊必须引领学术潮流,经世致用,避免曲高和寡。

范勇鹏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主任):

不同期刊应有明确的分工和特色。专业期刊应该鼓励案例研究、通则研究、历史比较研究,使内容精深化;综合类期刊则要侧重于整体性的研究。



魏红霞 (《美国研究》编辑):

在美国研究上,目前我国和美国处于不对等状态,学者很容易受媒体影响,研究很容易做成媒体评论的整合,这需要作者在学术和政策研究之间寻求平衡。

宋晓敏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研究》编辑部主任):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欧洲研究》开始注重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做出分析和判断,以体现中国学者的学术和人文关怀。通过全面深入地剖析欧洲的变化,密切跟踪它的动态,准确把握它的转型及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我们可以判断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中欧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



杨海蛟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政治学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创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在尊重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学生一定要注重基本理论的积淀,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专业方向。

高程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当代亚太》编辑部主任):

《当代亚太》是从国与国之间关系角度出发针对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领域的刊物。以中国为本位,从全球视角出发讨论亚太地区的国际问题,强调对东亚国家的国家行为与正在崛

*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刊登了部分发言人的部分言论。全体发言人的录音由曹滢、程康、郭晓琼、胡阳阳、李漩、刘芮宁、刘雨晨、宁鹏举、裴瑶、彭紫嫣、杨雪、于凯玥、张晓康、赵姝婧、左锦涛等整理。

起的中国之间的互动关联的关注。在稿件的选取上,需要看重稿件的质量和选题,其次,是在选题上突破刊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关注对中国现实有启示性意义的研究,如西方大国的崛起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动的借鉴意义等。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际问题研究》主编):

《国际问题研究》杂志淡化学术,偏重政策分析,除此之外,杂志每期都设有主题特稿,讨论当下的热点问题。



赵景来 (《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主编):

社会越发展,复杂性越高,人们以及社会组织的交往越频繁,就越需要学术机制和科学知识的理性反思。社会科学向人文科学的亲近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人性化,而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趋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与亲和力,展示出社会科学广阔的发展前景。

袁正清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世界政治经济》重点把握战略性和政治性的平衡、理论构建和现实关怀的平衡、定性和定量的平衡、国内和国际的平衡、政治和经济的平衡这五方面的关系。此外,学术编辑要有战略性眼光和学科敏感性,在学术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要构建好读者和学者之间的平台,由单一的处理稿件转变为参与到文章的创作和讨论中。

陈志瑞 (外交学院教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

研究的最大目的不是影响政策过程,而是要启发民智,把公共知识与大众分享;刊物要国际化,要从大外交、大国际方面考虑,区别于政策分析。

[责任编辑:沈琳]

记忆中的那一抹微笑

——访泰有感

蔡永晖*

随着《泰囧》的热映，电影中所展现的特有的风土人情、瑰丽的建筑与景色，使得“千佛之国”——泰国成为热点。正巧，电影上映的同时，我很荣幸的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一员，跟随团中央出访泰国，亲身感受泰国的点点滴滴。从泰国朋友对我们绽放的会心的微笑，到参观佛像时流露出的虔诚的眼神，每一个片段都深深埋藏在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记忆里。

爱之初体验——热情如火

一抵达泰国，我们最直接的感受是泰国天气十分炎热。零下8度与29度，这是北京与曼谷的温差，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过程。所以我们纷纷脱下了厚重的冬装，换上了阳光明媚的夏装，用肌肤感受赤道的热烈温度。

初到泰国，我们最深刻的感受是泰国人民非常热情。这几天我们碰到的几乎每一个泰国朋友和工作人员都对我们报以最灿烂的微笑，双手合十，轻轻地道一声——萨瓦迪卡。他们友善的举动，让我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我们在脱去冬装的同时，也渐渐卸下了内心的那份不安。

体验泰国，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泰国朋友极其热心。此次活动的泰方组织者、接待者、志愿者对我们展现了无微不至的关爱，他们周密的安排、贴心的服务，都使我们深受感动。代表团中的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小女孩地拉热，在习俗和饮食习惯上有很大不同，而泰国朋友在每一次用餐前都细致地为她指出哪些她能够吃，并且在她生病时将挑选好的饭菜送到她的休息处等等。泰国朋友们尽最大的努力，为我们此行保驾护航。

爱之浅感受——包容并蓄

感受泰国的精神气质，我被它的包容性所深深折服。首先，它能让古今中外的文化深度融合。一天晚上，我们来到曼谷著名的 Ceterpoint 广场，里面陈列着琳琅满目的高档商品，而广场的左角矗立着大象神的佛龛，许多多少男少女拿着香烛与玫瑰花，在此跪拜求取美好的姻缘。广场的右角边，有一个小型舞台，台上的摇滚乐团正在卖力地演出，台下疯狂的歌迷在拼命的嘶喊。在广场的前方，一大群小摊小贩正在贩卖各种小物件，对面墙上的一幅充满

* 蔡永晖，男，福建省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曾就读于福建工程学院。2012年12月11日至20日，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100人，对泰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是落实时任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和英拉总理关于2012年开展百名青年互访共识，推动中泰青年交流的实际行动。泰方曾于2012年9月率团来华访问并受到中方热情招待，此次访问是我方回访。

泰国元素的圣诞海报也在无声地暗示着这个西方传统节日的到来。在这个场景下，我驻足良久，仿佛看到了现代与传统、宁静与喧嚣、文明与无序、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在这个区域内如此好地融合在一起，不得不佩服这个国家海纳百川的气度。

感受泰国的包容性，它能让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和谐共处。我们曾前往清迈著名的皇家王子中学进行参观交流，这是一所基督教的教会学校，但学校 95% 的师生都信仰佛教。每天早晨升完国旗后，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信仰自行选择进行基督教或佛教的宗教仪式，其他学生则平静地开始自己一天的生活。这样一所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到如今发展成如此规模的高水平学校，一直受到政府与王室的大力支持，在这样的佛教国度里，能够淡化彼此的宗教界限，着实难能可贵。

感受泰国的包容性，它能保存与宽恕伤痕历史过往。他们引以为豪的是，泰国从未沦为殖民地，但是泰国也有被侵略的惨痛历史。我们参观大城府的历史遗迹的时候，目睹了许多伤痕累累、面目发黑的佛像，这都是缅甸侵略者留下的罪行。但是泰国人却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将所有的历史遗迹毫无修饰、回避地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坦然地供游客游览。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佛头被侵略者残暴地割下，以图泯灭民众之心，可是佛头却以另一种姿态与树根、土地融合为一，成为一道和谐情境，它是泰国人包容并蓄文化内核的最好体现。

感受泰国的包容性，它甚至能尊重与接纳一切人群。泰国被许多人称为“微笑之国”的原因在于泰国人对每一个人都会绽放美好的微笑，无论是泰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是贫穷还是富有，是男是女抑或人妖——也是由于这种一视同仁的友善态度，泰国才会孕育出特有的文化，才能让每一个有残缺的人在此找到失落的美好。所以在泰国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这个没有另类眼光的国家。

爱之深感悟——信仰的力量

在这个“黄袍佛国”，我们目之所及皆是佛龛与佛寺，我们也游览了玉佛寺和双龙寺等寺庙，可见佛教对于每个泰国人性格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感悟泰国，其实也是在感受他们心中信仰的力量。

因为信仰的力量，泰国人温和有序。宗教总能带给人一些内心的宁静，佛教更是如此。常伴青灯古佛旁，对于神灵的敬畏，化成了他们道德中最中性的部分，即“向上要相信美好，向下要相信底线”的温和的性格特性。他们不极端，不急躁。曼谷作为世界上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之一，面对动辄一两个小时的堵车，街上竟然几乎听不到喇叭的催鸣声，并且当有行人通过时，他们一定会停靠在行人前，等行人通过后再行驶，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有一次我去上街买东西，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翻来覆去地确认，在那个商店最忙的时候还和他们咨询了 20 分钟左右，但是他们没有丝毫



不耐烦，仍是以招牌的微笑面对我们的询问，这种温和的性格特质确实是他们国民性格中的一大特色。

因为信仰的力量，泰国人力行环保。在我印象中，发展中国家很多时候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泰国和我们一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泰国国民的环保意识之高却让我惊讶不已。在清迈的皇家王子中学，我们和学生一起共进自助午餐，用餐后我认真观察了泰国学生的剩菜剩饭量，近200个学生的剩菜剩饭量才刚刚莫过垃圾桶底，这样的结果让我唏嘘不已。另有一次，我们去清迈著名的夜市闲逛，发现人来人往的夜市中竟然没有一点垃圾。像这样的环保故事不胜枚举，这种深刻的环保意识，我觉得很大程度也是源自他们的信仰，真爱每一寸土地与资源的信念。

因为信仰的力量，泰国人务本守正。本次行程中，主办方为我们安排了两个农业项目的参访，即“一脱一品”农业园和正大公司旗下的农业村。一些人对此安排表示不理解，而我却觉得这是泰国人重视农业、重视土地的象征。泰国有一半以上的人仍然在从事农业，他们从未放弃过农业，一直在改善着农业。这份对农业与土地的情谊是与生俱来的，是割舍不断的，正是由于这种热爱，他们才将如此多的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作为拥有相似国情的中国，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吗？

因为信仰的力量，泰国人乐天知命。佛教教人要安天乐命、知足长乐，这种人生态度很大程度的影响着泰国人的价值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泰国很多方面不算发达，甚至有些地方还很落后，但是每个泰国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充满了正能量，幸福感指数很高。

短短的几天泰国之行，虽不能全面而深入地看清泰国的方方面面，但是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管它美好与否，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我相信若干年后洗净铅华，此次泰国之行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它那一抹迷人的微笑。

[责任编辑：马焱粮 于凯玥]

英采飞扬

【编者按】本期共收录五篇文章,其中前四篇是“线上讨论”中的来稿,分别讨论了“如何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以及“英国是否会退出欧盟”,第五篇则是一篇学生习作,主要讨论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社会的有政府状态”。

♣Discussions Online♣

Question 1: How can we solve territorial dispute peacefully?

That's easy. Negotiate, negotiate, and negotiate until everybody is tired. Or, wait for the relationship to warm up. A more difficult question is "how can we solve territorial disputes by military means?"

——Wang Jisi*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how to solve territorial dispute peacefully is one that concerned many people. Here are my opinions.

The first solution is negotiation. Negotiation is not only the most basic method, but also the most efficient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rough a proper negotiation, state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interests. After that, they may find a better way to handle the territorial problem. The second solution is to solve the dispute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States can ask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for help.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solv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Also, as I see it, there are sever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territorial dispute peacefully. First, states need to focus on bo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history. Second, states should take other states' interests into consideration. Third, until the problem is settled, no one should change the present territorial situation. Fourth, if the dispute cannot be solved easily, states should shelve controversies and pursue the joint development.

These are my opinions. It's my belief that states can solv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peacefully through thes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Song Mian**

*Wang Jisi is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is also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Song Mian is a sophomor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Question 2: Will the UK quit EU?

As far as I can see,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Cameron will suggest the probability that UK may quit EU. Since Britain never regards itself as a fixed part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many Britons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deepe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EU members. A poll says that 56% of Britons would vote to quit EU in referendum. So it's quite normal that UK will make such claims

But it's unrealistic for Britain to break up with EU. UK's export depends heavily on the rest members of EU, and City of London is hypersensitive to the stability of EU's financial markets. It's unimaginable how inconvenient it will be for Britain to revive its staggering economy. In my opinion, what Cameron said is largely a politician's assertion that will win people's supports. It's less likely that the Conservative Party's government should be so courageous to separate the UK from EU.

——Lyu Hai*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a majority of people would probably or definitely vote for the UK to go it alone if they were offered the choice in a referendum. If UK withdraws from EU, gains may be greater than the losses in the near future, but in the long run, the losses must be greater than the benefits.

In recent years, the UK wants to quit EU because EU requires member states to use the same tariffs on foreign trade policy. These policies have resulted in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conomic autonomy. What's mor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bt crisis, the Europeans hope the UK to contribute more to EU, and to hand over mo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to EU.

UK didn't join the euro zone, and nor did she become a member of the Schengen Agreement. All these years it has been trying to maintain its independence. But if Britain withdraws from EU, it will lose a huge market that provides protection for its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services. The reality is that if the UK quits EU, not only would the European market surprisingly atrophy, but also would will the UK's national positioning need to make major adjustments and Britain will pay a heavy price.

Due to the rupture of the tricyclic diplomacy, the United Kingdom joine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1973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But now it cannot opt to leave the EU because of the loss of economic benefits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ime.

*Lyu Hai is a junior student,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Britain must make the EU her strong support. Britain must become the lead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if she wants to be a great country in the world, rather than the opponen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Du Xin*

♣Short Essays♣

Anarchy and Hierarchy

Liu Miaomiao**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an anarchical society while the domestic society is a hierarchical society. In my viewpoint, this assumption makes sense to some degree.

When we sa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anarchy, we mean that it is leaderless: there is no higher authority and worldwide government. This point of view is approved by all three main schoo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alism, liberalism and radicalism, and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To begin with I need to mention a common sense that the sovereignty equality was consecrated by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and since then, states bega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vereignty, and as a result, the global system changed, and the core of the new system is anarchy. We can find many featur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at prove the essence of itself is anarchy. First is that the actors in the global society are stratified by their strength and power. That's why we usually put the United States rather than Iraq onto the top of the pyramid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tic structure. Second is that the legal uti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acks coercion. Because there are no higher authorities over st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ws becomes difficult. The third one is that no one in the global society monopolizes the military force and states must safeguard themselves on their own.

Compared with the features we mentioned above, let's see the concept of hierarchy, which refers to a system that is stratified according to its wealth, military, capability and prestige. As a citizen of the state, it's much easier for us to understand that our society is hierarchical in the domestic area. First stratification here is by power and rights. Take the feudal dynasty in China for example. From farmers to the officials, the status of them changed so much. Next is that we have to obey the contract law, which is forcedly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third feature is

* Du Xin is a sophomore, School of Applied English,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Liu Miaomiao is a freshma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hat the military force is monopoliz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security is provided for states by the national authority.

What I mentioned above all prov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anarchy and the domestic society is hierarchy. However, there are flaws in that point of view. Observing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it's not indeed there exist some states just like that "higher authorities". I think everyone knows who those states are and how they manipulate the others. "All the states are equal, but some state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These words do make the real sense.

[整理: 彭紫嫣 王宝盆 郭晓琼]

[责任编辑: 吕海]

..... 漫画欣赏

来自朝鲜的陨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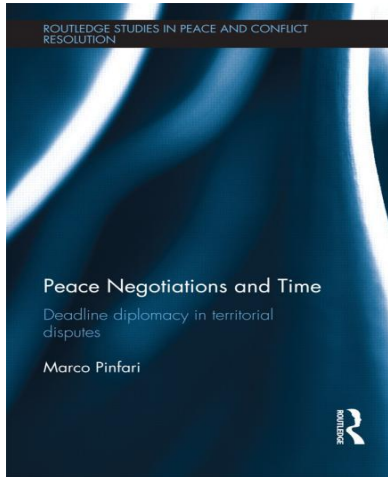


面对来自朝鲜这颗危险的“陨石”，韩美该如何应对？

[整理: 马焱粮 李冰莹 李漩 李安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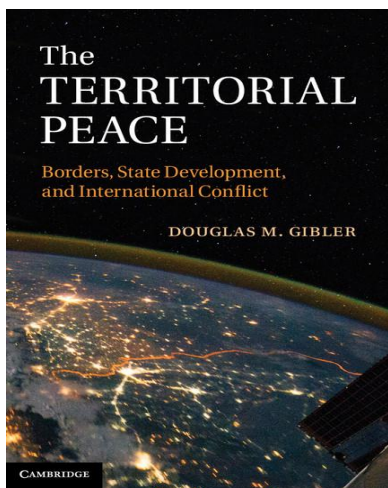
新书架 (一)

【编者按】近年来,关于中国领土争端问题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中日领土争端更于近期成为焦点。领土争端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什么?外国学者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美国在中日关系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美欧之间如何就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开展合作?本期新书架以此为主题,介绍近年来的相关书籍,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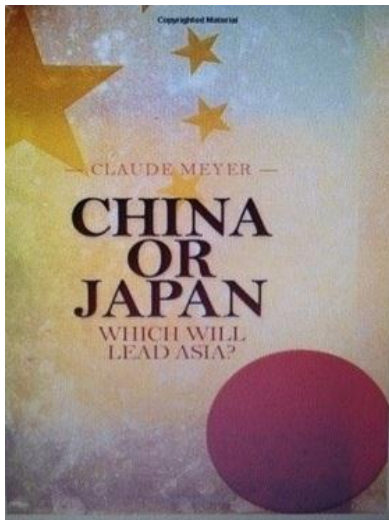
马克·平法利:《和平谈判与时间:领土争端中的限期外交》,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Marco Pinfari, *Peace Negotiations and Time: Deadline Diplomacy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2.)

这本书讨论了在后冷战时代,时间在和平谈判与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在固定时间期限会促进实用主义的假设下,截止日期越来越多的被调停者用来刺激陷入僵局的谈判进程。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的耐久性,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通过减少各自处理复杂问题、复杂团体变化和不同文化的关系的能力,时间压力会对个体和集体决策者产生消极影响。本书通过案例研究表明较小的时间压力会对协议的持久性产生积极影响,时间压力也只在解决某些僵局的情况下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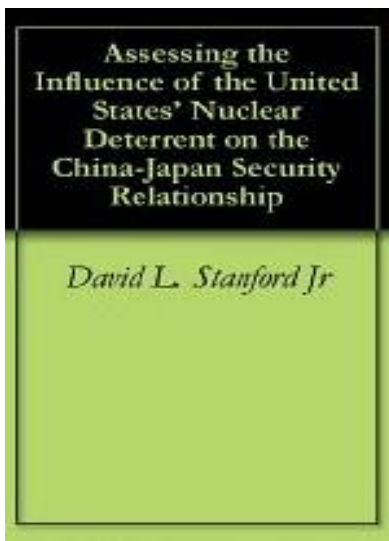
道格拉斯·M·吉普勒:《领土的和平:边境、国家发展和国际冲突》,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Douglas M. Gibling, *The Territorial Peace: Borders, Stat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有关“民主和平论”的学理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本书认为,本土受到威胁会促使国家内部集权化。作者提出了三个理由:首先,领土威胁对领导人来说是突出的威胁,领导人必须通过提升国家安全状况来回应;其次,受威胁的领土必须被大量常驻军队保护,而这些军队在和平时期可镇压反对派;最后,在国土受威胁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常见的讨价还价会消失,反对派会和领导人一起致力于提升国家安全,领导人因此会有一个能将更大的行政权机制化的有利环境。这些能够解释为什么冲突常常与集权国家有关,而和平则常与民主国际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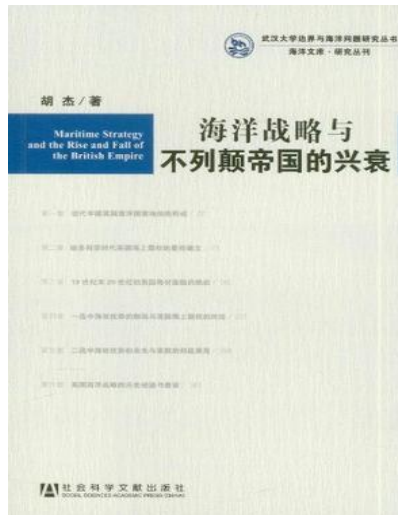
克劳德·迈耶:《中国还是日本:谁将领导亚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Claude Meyer, *Japan or China: Which Will Lead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在汗牛充栋的中日关系研究成果中,来自欧洲的声音相对少见。法国的迈耶教授在本书中客观地介绍了在未来几十年亚洲一体化过程中,中国和日本作为该地区两个主要大国在这个将要形成的新的亚洲共同体中各自拥有的优势和不足,描绘出中国和日本在未来二十多年中可能出现的场景,为中国读者提供了盎格鲁-撒克逊视角之外的中日关系研究版本。中日虽有摩擦,和平发展仍是东亚主流,如何明智地看待和解决地区一体化中的问题,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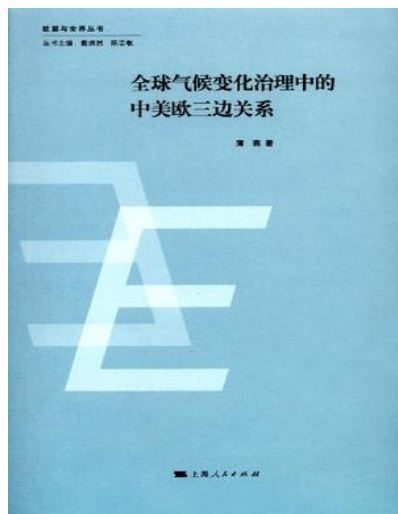
大卫·斯坦福·乔丹:《评估美国核威慑对日本和中国安全关系的影响》,蒙特雷:美国海军研究生院,2012年。(David Stanford Jr,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Nuclear Deterrent on the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Monterey: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12.)

美国对日本的核承诺究竟对中日关系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传统意义上认为,虽然美国影响的整体平衡性对东京和北京的紧张关系有缓和或加剧的作用,但是华盛顿的核保证对于阻止日本进行核武装特别是减少紧张关系起到一定作用,而增加紧张的原因是由于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预测(即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许多学术研究一直致力于分析通常意义上的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的影响力已经在评估的程度与方向上发生变化。本文认为,美国在延伸其威慑的影响方面的作用变得更加微妙,虽然美国的强大影响有助于在长期内改善东亚的敌对状态,但同时也激化了东亚地区短期的紧张局势。本书发现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伞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弱。



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历史角度探讨世界主要大国海洋政策的专题论著，它系统梳理了英国海洋战略的发展线索，深入分析了海洋战略与英国兴衰的内在联系，并概括出英国的经验教训对当前中国建设现代海洋强国的启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近代早期英国海洋国家地位的形成；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海上霸权的最终确立；世纪末世纪初英国海权所面临的挑战；英国海权优势的削弱与丧失，英国海上霸权的终结与英国的彻底衰落；英国海洋战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本书第一次对海洋战略与英国兴衰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作者提出了英国古典海权这一全新概念，并认为这一海权代表了英国海权的一般模式，即具备稳健性、威慑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在对英国海洋战略的演变进行历史解读之外，作者结合政治学的分析方法，综合运用霸权理论、均势理论和地缘政治学说等剖析英国的海洋战略特点和霸权模式，使得全书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薄燕：《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本书在比较中美欧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三边关系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探讨了中美欧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三边关系，包括其演变过程、形态特征和影响因素，也论及该三边关系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影响及管理该三边关系的可能策略。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欧既是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还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关键建设者，这些构成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基本要素。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不断推进，中美欧三边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分别表现出欧美合作高于中美和中欧合作、中欧合作超过欧美和中美合作、“浪漫三角共处”、美中联手使欧盟被边缘化等不同关系形态，并揭示出其总体的合作性、局部具体问题上的竞争性以及动态变化等特征。

[供稿：吕海程康王宝盆宁鹏举]

[责任编辑：刘雨晨]

♣系内新闻♣

星野昭吉教授做客南开

(通讯员:石宇)3月5日晚,日本独协大学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国际政治协会常务理事星野昭吉教授做客南开大学,并做了题为“全球政治中的中日关系”的讲座。讲座在范孙楼116会议室举行,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出席了该讲座,国际关系系的部分学生参加了讲座。

星野昭吉教授首先介绍了全球政治的特征,随后就中日关系谈了自己的观察与意见。他认为,全球政治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未来既可能走向协调,也可能走向对抗和无序,政治过程越来越国际化;二战后,经济、环境、恐怖主义等问题出现,与传统的军事问题相并列,多种问题交织;国家间界限越来越模糊,军事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下降,但国家间的军事竞赛甚至有加强的趋势;南北问题凸显,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第四世界”国家;而随着国际问题和认同的多元化,全球治理正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方面,国家的界限在应对全球共同问题时也将变得越来越模糊。

星野昭吉教授认为,中日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政治日益复杂化的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会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而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国和保护国,对日本的政治更迭及中日关系有着重要影响。日本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自去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后,日本民众受到日本政府和媒体宣传的影响,对中国政府的印象恶化,认为中国是其首要威胁。他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日本政府改变现



有立场,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双方退回到搁置争议的立场上来发展中日关系,同时美日特殊关系是导致中日关系迟迟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因素。

将近九十分钟的讲座结束后,星野昭吉教授与现场学生就影响日本国民对华态度的因素、中日合作的前景等问题展开了交流。

星野昭吉教授是日本独协大学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常务理事。194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64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国际关系专业博士毕业。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冲突与和平根源》、《世界政治的原理与动力》、《世界政治的变迁与权力》、《国际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等。星野昭吉于2011年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蒲晓宇博士讲座：“国际政治的地位信号”

(通讯员：石宇) 3月15日下午3点，蒲晓宇博士在南开大学主楼425教室带来了题为“国际政治的地位信号——多面中国的形象管理”的讲座。蒲晓宇博士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03届硕士，后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的博士后。张睿壮教授、韩召颖教授、刘丰副教授、王翠文副教授、黄海涛老师、杨娜老师及国际关系系的部分学生参加了该讲座。

蒲晓宇认为，国际政治中的信号传导和战略互动无处不在。而信号传导理论也存在于经济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领域。生活中也存在很多信号传导的例子，比如通过买豪车等炫耀性的消费行为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个人能力等。同样，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也通过一些行为来传达自己对自身国家地位的定位。一种是有代价的行为，比如炫耀性的消费或给予，另一种是无代价的行为，比如外交中的宣示等。一个国家向外界传递其作为大国的信号，是为了获得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和地位、提高自身的声誉或增强内部凝聚力；而一国如果传达其作为小国的信号的话，则是欲借此加强与别国的团结合作或躲避某些国际责任，以便有更多精力来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外界的部分观点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因此提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而中国国内的观点与此并不相同。蒲晓宇在讲座中还选取了三个案例，分别是中国的航母计划建设、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一直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在区域中积极承担责任，但认为自身在东亚以外的区域里没有太多的责任。同时，中国向来比较偏好“俱乐部式的国际地位”(status as club good)，比如在“金砖国家”等机制中的地位，但拒绝参加存在位势竞争式的地位(status as position good)组织争夺。一方面，中国在努力传达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信号，希望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有限责任。另一方面，美国等国家视崛起中的中国为威胁和挑战，中国周边国家也担心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对发展的中国“爱恨交加”。可以说，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形象(image)具有多面性，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形象”也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战略利益，因此加强对中国形象的管理更显重要。

讲座结束后，现场的师生与蒲晓宇博士就信号传递和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动态进行了积极互动。最后，韩召颖教授做了简要总结，鼓励并要大家见贤思齐，掌握好基本的研究方法，多学习蒲晓宇博士严谨的学术风格，做出好的研究设计。

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做客南开大学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张萌)3月26日,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集团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威廉·科恩做客“周恩来论坛”,并带来了题为“中美关系如何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的演讲。

科恩在演讲中提到,在中国做生意,4个“R”尤为重要,即“respect, relationship, regulations, reputation”,即尊重、关系、法规和声望。在谈到当代美国政治的特点时,科恩用了四个“S”来概括:stalemate, stagnation, sequestration, stupidity,即僵局,停滞,分离,愚蠢。

科恩提到,现在美国没有能力找到解决其16万亿债务的建设性措施。于是这些债务被一代代的年轻人继承。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哲学不同,因此他们不可能相互妥协,因此即使
国会 有 500 多
可能找到一
的折中方式。
认为美国应
开支,共和
削减社会开
就一直争论
果,直到下
以美国年轻
里?中国人



人的未来在哪
国人民越来越富有,而美国人民越来越贫穷。以前15个美国人供养一个老人,现在是3个供养一个老人,美国老龄群体越来越壮大,但是却能够供养他们的有工作的年轻人却没有增加。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老龄化,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两党无法达成一致,我想谈论的不只是国防开支削减问题,同样还有医疗保险问题,美国有4千万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尽管奥巴马推出了“奥巴马保险”,但是他是通过征收高税收来推行的。

科恩说,中国树立一个愿景,然后就能立刻执行,但是美国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我们为了防止权力滥用而分权,我们相互制衡,却不能立刻采取行动,因为没有能够负责的人。

科恩认为,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的历史、文化,也有自己面临的独特的挑战。中产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要求有更好的生活质量,需要政府进行更好的调控,要求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中国的能源来源主要是煤炭,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能源是煤炭,我们要想方设法如何让煤炭更加清洁,同时中国也要发展其他的能源,例如核电、水电、风电。

科恩还谈到,习近平主席曾到美国爱达荷州进行访问,爱达荷州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地区,习主席与那里的农民建立的亲密的关系,并且仔细地了解了当地农业发展的现状。中国要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同时,也应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讲座后,科恩还回答了现场同学的提问。

在回答“日本否认历史是否扰乱世界秩序”的问题时，科恩先生毫不避讳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面对历史，当代人所应做的是“铭记”，是不再重蹈覆辙，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跨步向前。

关于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和快速发展，科恩提到，中国的力量不断增强，在短短时间内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0年后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前，美国是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中国是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是第四，中国所做的不是称霸，而是促进地区稳定。科恩认为需要不断展开两国军事部门之间的对话，以消除不信任。

关于政府应如何提高软实力，科恩特别提到了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携夫人到访俄罗斯、南非等地。他说，这是一个显著的象征，这显示了中国女性对促进中国经济繁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也是一种软实力。外交、国际经济参与也都是软实力的一部分。国家、政府要创造就业机会，努力减少战争，求同存异，调和矛盾，增强信任。科恩表示，今年，科恩集团将拿出一笔资金用于中国学生的奖学金，首批资金为10万元，希望将来他们能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为中国的环境改善和医疗改革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在回答“中国政府如何推行法治，解决腐败、食品药品安全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时，科恩提及“中国梦”和“美国梦”。他说，“美国梦”就是成为想成为的任何人，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科恩以自己为例，据他介绍，他的父亲是一个面包师，家庭不是很富有，也不贫穷，但是他得到并把握住了机会，使得他能够有所成就。“美国梦”同“中国梦”一样，是每个人的梦想，也是共同的梦想，做到最好，成为想成的任何人，保持开放的思想，不断激励自己，中国现在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

在谈及中美关系走向时，科恩先生表示，美国战略转向亚太是因为亚太地区拥有众多的人口，并且也是美国重要的贸易往来地区，美国的战略有利于亚太的经济、安全、商业。如果亚太地区稳定，则可以吸收大量投资，如果不稳定，则资本会逃离。很多国家都担心中国称霸，所以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提高参与度，使得中国力量惠及整个亚洲。美国不能遏制中国，美国既要保持亚太稳定，又要使中国获得利益，所以只能中美两国人民合作，来应对食品、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等问题，共建和谐世界。

关于中国建造的第一艘航母，科恩表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会保持领先地位，因为美国已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中国则会后来居上。美苏冷战时期，双方都布置了大量导弹对着彼此，事实上布置导弹只是为了威慑。应该加强国防部同级官员之间的对话，以消除误解，增强信任，维护地区稳定。

♣校外短讯♣

北京大学

●2012年11月10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担任课题负责人的2012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技术研究”在北大举行了课题启动会议暨专题实施方案论证会议。来自诸多单位的40余位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启动会议由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主持。

●2013年1月15-16日,主题为“挑战与合作:崛起中的中国和调整中的美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以及应对全球问题”的北大-哈佛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召开。会议由教育部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埃希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共同举办。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大卫·艾尔伍德(David Ellwood)、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傅高义(Ezra Vogel)、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美国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艾江山(Karl Eikenberry)、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美关系专家袁明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院长姚洋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与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Richard Rosecrance)教授共同主持了研讨会。

北京外国语学院

●2013年1月,由尹继武老师主持翻译的“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首批4本正式出版,包括《公共舆论》、《总统风格》、《政治心理学》和《政治头脑》,其余《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救赎政治:奥巴马的总统历程》、《政治广告》和《总统的性格》等4本著作将陆续出版。

●日前,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和张颖副教授编辑的《周恩来公共外交访谈录》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口述史的形式展示了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非凡的外交智慧和高超的谈判技巧。

复旦大学

●2013年3月7日,复旦大学制度建设研究中心第五十六期讲座在文科楼615会议室举行。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课题组邀请,正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访学的外交部亚洲司李碧建参赞做了“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中的风格与特色”的讲座。

●2013年1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了2012年一级学科评估结果。复旦大学政治学、公共管理两个一级学科参加了此次评估。其中政治学评估结果是名列全国第一,该学科在此前的一项国际评估中,也名列中国大陆高校第一。

清华大学

●2013年3月7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新知论坛第三讲顺利举行。清华大学副

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懋修(Matt Ferchen)做了题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国际形象》的演讲。

●2013年3月6日上午,印度知名学者、专栏评论家和作家 Ramachandra Guha 先生访问国际关系学系,做了题为“印度:在国家统一与文化多元之间寻找平衡”的演讲。Guha 先生通过多元性和差异性两个维度谈了对印度现代社会的认识。

人民大学

●2013年1月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论坛在人民大学的明德主楼举行。

●2013年1月15至16日,“中英下一代核对话”(China-U.K. Next-Generation Nuclear Dialogue)在明德国际楼813会议室召开。对话由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战争研究系科学与安全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ce & Security Studies)和中

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举办。这一对话的目的是为中英两国的青年学者搭建讨论核武器和核军控等议题的平台,构建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网络。

国际关系学院

2013年1月15日,国际关系学院的英语系和日法语系合并组成外语学院(二级学院),郭惠民副院长(校)长兼任外语学院院长,李岩任外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2013年3月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进程与前景”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分别探讨金砖国家合作进程评估、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合作构想、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前景与中国的角色三个专题。

[整理:杨雪 曹滢 李安琪]

[责任编辑:杨雪]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2年12月——2013年3月)

1. 阎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

内容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制裁作为成本较低、政策实施可控、可逆的对外政策工具,其作用受到更多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重视,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各种国际争端。中国外交迄今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对外经济制裁经验,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支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政策目标主要是促使对方改变对外政策以及对外显示外交信号等。从实施主体看,中国多使用单边经济制裁,同时也谨慎而有选择地参与了部分多边国际经济制裁。就制裁范围与强度而言,中国多采取有选择制裁而非全面制裁。在制裁内容方面,贸易制裁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金融制裁的潜在作用仍有待挖掘。在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制裁政策应反映何种外交价值观及传统文化,如何与其他对外政策工具协调,以及在制裁实施中应把握哪些外交智慧和技巧,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

关键词: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国际经济制裁;单边制裁;多边制裁;对外援助

作者简介: 阎梁,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防务经济学等。

2. 吴志成:《欧债危机的演进与有效的全球治理》,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内容摘要: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推动一体化进程、维护区域整体和平,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和人民进行着持续不懈的艰辛探索,欧洲区域合作的伟业在曲折中克难前行。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9年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不断遭遇险阻,欧洲联盟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欧债危机的演进不仅暴露出欧洲一体化内在的不足,使欧元区国家主权财政与统一货币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也反映了新时期当代全球治理有效性的缺失。

关键词: 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进程;债务危机;政治一体化;偿付危机;经济一体化;欧洲经济;欧元区;国家主权;艰辛探索

作者简介: 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等。

3. 王翠文:《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与现实》,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内容摘要: 拉美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与变革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以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为标志,是新旧秩序之争;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在拉美由盛而衰,新自由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力量相互消长;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十年,全球治理时代多元行为主体的“百家争鸣”。在全球化与全球秩序演变进程中,拉美国家的实践主要受国家能力、意识形态、国际制度三个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实践的先行者,代表和反映南北关系的核心利益和问题实质;二是理论的自觉,坚守本土化的知识传统,为全球治理和秩序变革提供知识类的公共产品。

关键词: 国际经济新秩序; 南北关系; 新自由主义;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王翠文,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4. 刘兴华:《印度的全球治理理念》,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内容摘要: 印度的全球治理理念有着深厚的国内根源,包括印度的自然禀赋、被殖民的历史、政治文化、国内思潮、重大危机和经济发展模式。它既体现出多边主义的特征和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倡导,也高度强调国家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全面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和学习既有规则的前提下,印度寻求对全球治理制度进行局部改革。印度将自身定位于介于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媒介,追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大国身份和地位,同时意识到以亚洲为中心的政策是拓展印度全球影响力的基础。

关键词: 印度; 全球治理; 理念

作者简介: 刘兴华,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国际规范、全球化与地区化等方面的研究。

5. 杨雷:《俄罗斯的全球治理战略》,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内容摘要: 俄罗斯的全球治理战略形成于其对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的判断、“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认识、全球问题凸显和西方国家持续挤压的背景之下,在内容和特点上均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主张继续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各项机制,在政治、地区安全、经济、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安全、粮食危机等全球问题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总体上看,俄罗斯全球治理战略的基本特点是:珍视和努力再塑自己的大国地位,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重视国家主权,反对西方国家利用非政府组织对他国事务的干预。俄罗斯积极有为的全球治理战略扩大了其外交政策的效果。

关键词: 俄罗斯外交; 全球治理; 国际合作; 全球化

作者简介: 杨雷,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俄罗斯中亚社会政治发展、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等研究。

6. 黄海涛:《南非视野下的全球治理》,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内容摘要:由于非洲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全球问题在该区域有较为集中的体现。然而,多数非洲国家以及非盟在全球治理中表现欠佳。作为非洲大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新”南非逐渐有意识地参与全球治理,这有助于防止非洲被继续边缘化。兼具“非洲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三重身份的南非在应对全球问题时的基本策略是:以“非洲复兴”为立足点,坚持“泛非主义”和“南南团结”,重点依靠“新兴国家”整体力量提升在全球和区域问题中的话语权,以多边协商方式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规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既有全球治理格局、非洲区域形势、国家实力与国内治理问题都制约着南非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全球治理;非洲复兴;新兴国家;南非外交政策

作者简介:黄海涛,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分析、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等方面的研究。

7. 吴志成、朱旭:《西南欧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载《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1期。

内容摘要:西南欧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步较晚,长期处于相对孤立和封闭的边缘状态,成为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研究“被遗忘的角落”。尽管国际关系学科在西南欧国家已经得到学术上的认可,并获得了稳固地位,但尚未形成自己独创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随着西南欧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其国际关系研究的成就和影响必将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

关键词:西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国际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等研究;朱旭,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

8. 韩召颖、王石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负面影响》,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7期。

内容摘要:出于对自身优势的过分自信和未来前景的焦虑,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成为一种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有着夸大中美权力转移所带来危险的倾向。美国不肯承认中国在亚太地区应有的安全需求和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鼓动其亚太盟友挑战中国,试探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中美要走向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双方首先需要防止中美关系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溢出“非敌非友”的框架。

关键词: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防御性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韩召颖,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等方面的研究;王石山,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

9. 赵龙跃、管传靖:《美国霸权危机与自由国际主义新动向》,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期。

内容摘要: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由于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困扰、国际上采取单边行动的影响,其霸权地位面临危机,如何避免衰退、维持霸权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在最近几年的讨论中,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学派表现活跃,通过组织重大研究项目等,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论述和论著,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全球战略观。系统分析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全球战略思潮的新动向,明确其理论的本质和特点,对于我国全面认识和有效应对美国全球战略新变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美国霸权;自由国际主义;全球战略

作者简介:赵龙跃,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经贸关系、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谈判等;管传靖,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国际制度、美国外交政策等。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

- 1.张宇燕:《经济增长源泉与中华民族复兴》,第1页。
- 2.彭成义:《“亚太新秩序:政治与经济的区域治理——第三届亚洲研究论坛”会议简讯》,第2页。
- 3.张文木:《“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规律和特点》,第5-39页。
- 4.曾向红、杨恕:《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动力与机制研究——以埃及变局为中心》,第40-66页。
- 5.周建仁:《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第67-92页。
- 6.曾怡仁、李政鸿:《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第93-115页。
- 7.许琳、陈迎:《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第116-134页。
- 8.薄燕:《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一种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框架》,第135-155页。

《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

- 1.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第4-21页。
- 2.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第22-46页。

- 3.曲博:《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东亚货币合作:一种亚洲模式?》,第47-63页。
- 4.黄琪轩:《世界政治中的“权力贴现率”与美元贬值》,第64-89页。
- 5.项卫星、王冠楠:《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基于“金融恐怖平衡”视角的分析》,第90-111页。
- 6.成新轩:《论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第112-128页。
- 7.贺平:《地区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贸易自由化的路径之争》,第129-153页。

《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

- 1.黄仁伟:《未来5至10年的大国战略走向》,第1-8页。
- 2.蔡鹏鸿:《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第9-16页。
- 3.鲁茉莉:《试论国际金融安全网的加强》,第17-24页。
- 4.吴澄秋:《经济治理理念结构的变迁——兼论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第25-32页。
- 5.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第33-40页。
- 6.韦宗友、张鹏:《第三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暨“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第41-45页。
- 7.杨剑:《美国“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的语境矛盾及其本质》,第46-52页。
- 8.曹磊:《网络空间的数据权研究》,第53-58页。
- 9.朱中博:《儒家的大战略思想导向及其两面》,第59-65页。
- 10.沈陈:《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中国亚洲外交的新思路》,第66-72页。
- 11.杨力、任嘉:《单一货币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第73-79页。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 1.吴澄秋:《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路向何方?——基于全球化时代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第1-15页。
- 2.阎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第16-29页。
- 3.游览:《技术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冷战时期中国对在越南实习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第30-51页。
- 4.贺平:《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第99-112页。
- 5.王平:《日本对非政府开发援助述评:外交战略的视角》,第113-126页。
- 6.归泳涛:《日本的动漫外交——从文化商品到战略资源》,第127-140页。
- 7.高兰:《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第52-69页。
- 8.徐万胜:《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第70-81页。
- 9.尹晓亮:《日本能源外交与能源安全评析》,第82-98页。
- 10.张华:《国际司法裁决中的海洋划界方法论解析》,第141-154页。
- 11.王逸舟:《曲高不惧和者寡——评李英桃教授新著<女性主义和平学>》,第155-156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

- 1.夏立平:《论国际核安全体系的构建与巩固》,第1-6页。
- 2.何奇松:《近年美国网络威慑理论研究述评》,第7-10页。
- 3.王树春、万青松:《试析俄“转向亚洲”战略》,第11-15页。
- 4.杜冰、李莉:《印巴关系回暖及其前景》,第16-21页。
- 5.肖克:《缅甸改革及其前景刍议》,第22-30页。
- 6.鹿音:《如何构建中美新型战略稳定?》,第30-37页。
- 7.张文宗:《中美邻在东亚如何良性互动?》,第38-44页。
- 8.罗国强:《日本“购岛”之举的国际法效力解析》,第45-48页。
- 9.廉德瑰:《简析美国钓鱼岛政策的模糊性》,第48-54页。
- 10.余民才:《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5-62页。

《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6期

- 1.宋涛:《继往开来,共创中欧关系美好明天》,第1-5页。
- 2.乐玉成:《推进下阶段中美关系要做到“四好”》,第6-10页。
- 3.陈健:《试论新型大国关系》,第11-17页。
- 4.倪峰:《大选后美国对外政策走向》,第18-20页。
- 5.袁鹏:《美国大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第21-22页。
- 6.朱锋:《奥巴马连任对美亚太安全政策的影响》,第22-25页。
- 7.阮宗泽:《中美面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机遇》,第25-27页。
- 8.楚树龙、应琛:《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长期方向》,第28-32页。
- 9.沈丁立:《中美关系:竞争合作风险增大》,第32-34页。
- 10.吴心伯:《今后四年美国对华政策走向与中国的对策》,第34-36页。
- 11.陈永龙:《中美关系将曲折前行》,第36-37页。
- 12.周世俭:《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举足轻重》,第37-38页。
- 13.元简:《页岩气革命给美国气候政策带来的挑战》,第39-49页。
- 14.马莉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基础与选择》,第50-61页。
- 15.王友明:《〈美日归还冲绳协定〉私相授受钓鱼岛的非法性》,第61-62页。
- 16.石泽:《后危机时期的中亚形势:成就与挑战》,第62-75页。
- 17.曾向红:《乌兹别克斯坦与集安组织的曲折关系》,第76-84页。
- 18.何桂全:《缅甸吴登盛政府改革评析》,第85-96页。
- 19.杨时超:《新加坡的经济外交》,第97-108页。
- 20.姜志达:《印尼苏西洛政府的“自信”外交》,第109-117页。

《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

- 1.张丽娟、高颂:《美国促进农业出口政策机制研究》,第7-28页。
- 2.徐彤武:《“外围团体”对2012年美国大选的影响》,第29-53页。
- 3.王金强:《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演变与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向》,第54-76页。
- 4.杜幼康:《劳伦斯·萨默斯的“孟买共识”评析》,第77-90页。
- 5.李建人:《浅论美国情报机关预算信息公开——以“阿福特古德诉国家侦监局案为例”》,第91-106页。
- 6.蔡翠红:《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第107-121页。
- 7.王缉思:《世界发展趋势及中美关系前景》,第122-125页。
- 8.宫力:《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变与中美关系》,第126页。
- 9.黄仁伟:《从美国走向霸权的过程看当前中美权力转移》,第126-127页。
- 10.陶文钊:《如何看待美国的战略调整》,第128页。
- 11.夏立平:《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第128页。
- 12.徐辉:《独特的中美关系需要独特的管理模式》,第129页。
- 13.刘学成:《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形势和特点》,第130-131页。
- 14.卢宁:《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亲历者说——杰弗里·贝德<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评介》,第132-144页。
- 15.贾敏:《对当代美国政治文化冲突的思想诊断——读丹尼尔·罗杰斯的<断裂的年代>》,第145-155页。
- 16.余功德:《“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年会综述》,第156-157页。

《欧洲研究》2012年第6期

- 1.丁纯、陈飞:《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表现——聚焦北欧、莱茵、盎格鲁撒克逊和地中海模式》,第1-19页。
- 2.米歇尔·阿格里埃塔:《处在转折关头的欧洲和世界经济》,第20-40页。
- 3.高运胜、尚宇红、潘群娣:《欧元汇率波动对中欧商品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SITC分类的弹性测算》,第41-53页。
- 4.李竞强:《突尼斯民主政治化中的欧洲因素分析》,第54-72页。
- 5.夏立平、孙崇文:《论冷战后时期的北约核战略》,第73-86页。
- 6.胡琨:《欧元区最后贷款人机制的制度创新》,第87-101页。
- 7.夏文华:《欧盟公共政策的规制性解析——理论评析与实证考察》,第102-119页。
- 8.吴大新:《国际资本规则之争的政治经济分析——以欧洲会计一体化进程为例》,第120-140页。

- 9.孙莹炜、张海洋:《“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欧洲转型及其影响”会议综述》,第141-144页。
- 10.赵珂、徐清、史惠宁:《“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德建交40周年”研讨会综述》,第145-148页。
- 11.卢睿珺、鞠维伟:《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把握机遇、扩大共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国际会议暨中国欧洲学会中东欧研究分会成立大会”综述》,第149页。

《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3期

- 1.王勇、[澳]马克·比森、[南非]索科·米尔斯:《南非与澳大利亚对中国资源战略政策的比较研究》,第5-23页。
- 2.徐佳君:《评析世界银行绩效导向的援助分配政策》,第24-36页。
- 3.[印度]阿帕拉吉培·比斯瓦斯:《金砖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关系——以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发展模式为例》,第37-48页。
- 4.[美]范图·切鲁:《金融危机与发展中国家——寻找进步的全球发展议程》,第49-59页。
- 5.[法]艾·妮·桑赞格尔:《亚洲增长经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相关性——一种经济学视角》,第60-85页。
- 6.赵晨:《中美欧全球治理观比较研究初探》,第86-103页。
- 7.周晓明:《欧盟国际人格的演进——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里斯本条约>》,第104-121页。
- 8.罗峰:《美国总统的政治修辞——对布什关于伊拉克战争修辞的考察》,第122-132页。
- 9.赵明昊:《迈向遏制战略?——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内有关大战略的论争》,第133-162页。
- 10.李欣:《组织化利益与政治性行动——国有企业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分析》,第163-175页。
- 11.叶淑兰:《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与中国特色——评<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第176-181页。
- 12.陈昌煦:《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第182-183页。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7, No.1

- 1.Jessica Chen Weiss, “Authoritarian Signaling, Mass Audiences, and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 pp. 1-35.
- 2.Thomas M. Dolan, “Unthinkable and Tragic: The Psychology of Weapons Taboos in War”, pp. 37-63.

3. Bernd Beber and Christopher Blattman, "The Logic of Child Soldiering and Coercion", pp. 65-104.
4. Geoffrey P.R. Wallac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orture: An Experimental Study", pp. 105-140.
5. Matthew Kroenig, "Nuclear Superiority and the Balance of Resolve: Explaining Nuclear Crisis Outcomes", pp. 141-171.
6. Todd S. Sechser and Matthew Fuhrmann, "Crisis Bargaining and Nuclear Blackmail", pp. 173-195.
7. Robert Urbatsch, "A Referendum on Trade Theory: Voting on Free Trade in Costa Rica", pp. 197-21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7, No.1

1. Thomas Hegghammer,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Western Jihadists' Choice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Fighting", pp. 1-15.
2. Lisa Blaydes and Eric Chaney, "The Feudal Revolution and Europe's Rise: Political Divergence of the Christian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before 1500 CE", pp. 16-34.
3. Thad Dunning and Janhavi Nilekani, "Ethnic Quotas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Caste, Parties, and Distribution in Indian Village Councils", pp. 35-56.
4. James N. Druckman, Erik Peterson and Rune Slothuus, "How Elite Partisan Polarization Affects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 pp. 57-79.
5. Yotam Margalit, "Explaining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pp. 80-103.
6. Josiah Ober, "Democracy's Wisdom: An Aristotelian Middle Way for Collective Judgment", pp. 104-122.
7. Jeffrey Edward Green, "Rawls and the Forgotten Figure of the Most Advantaged: In Defense of Reasonable Envy toward the Superrich", pp. 123-138.
8. David Clepley, "Beyond Public and Private: Toward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pp. 139-158.
9. Jens Hainmueller and Dominik Hangartner, "Who Gets a Swiss Passport?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Immigrant Discrimination", pp. 159-187.
10. Daryl G. Press, Scott D. Sagan and Benjamin A. Valentino, "Atomic Avers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aboos, Traditions, and the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 pp. 188-206.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4

1. Michael W. Doyle, "Dialectics of a global constitution: The struggle over the UN Charter", pp. 601-624.

2. Vivienne Jabri, "Cosmopolitan politics, security, political subjectivity", pp. 625-644.
3. Martin Shaw, "From comparative to international genocide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of genocide in 20th-century Europe", pp. 645-668.
4. Ulrich Franke and Ralph Weber, "At the Papini hotel: On pragmatism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69-691.
5. Karen Lund Petersen, "Risk analysis – A field within security studies?", pp. 693-717.
6. Diana Panke and Ulrich Petersohn, "Why international norms disappear sometimes", pp. 719-742.
7. Harriet Bulkeley and Heike Schroeder, "Beyond state/non-state divides: Global cities and the governing of climate change", pp. 743-766.
8. Jarrod Hayes, "The democratic peace and the new evolution of an old idea", pp. 767-791.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7, No.3

1. Stephen G. Brooks, G. John Ikenberry, William C.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pp. 7-51.
2. James K. Sebenius, Michael K. Singh, "Is a Nuclear Deal with Iran Possibl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ran Nuclear Negotiations", pp. 52-91.
3. Jeffrey W. Knopf,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Examining the Linkage Argument", pp. 92-132.
4. Aaron Rapport, "The Long and Short of It: Cognitive Constraints on Leaders' Assessments of 'Postwar' Iraq", pp. 133-171.
5. Joshua R. Itzkowitz Shiffrin, Michael Beckley, "Debating China's Rise and U.S. Decline", pp. 172-181.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4

1. Etel Solingen, "Of Dominoes and Firewalls: The Domestic, Regional, and Global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pp. 631-644.
2. Fabian Barthel and Eric Neumayer, "Competing for Scarce Foreign Capital: Spatial Dependence in the Diffusion of 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pp. 645-660.
3. Stephen Bell, "The Power of Ideas: The Ideational Shaping of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Business", pp. 661-673.
4. Jacqueline Best,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History of Debating IMF Conditionality", pp. 674-688.
5. Apichai W. Shipper, "Influence of the Weak: The Role of Foreigners, Activism, and NGO Networks in Democratizing Northeast Asia", pp. 689-703.
6. Moonhawk Kim, "Ex Ante Due Diligence: Formation of PTAs and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pp. 704-719.

- 7.Zeev Maoz and Belgin San-Akca, "Rivalry and State Support of Non-State Armed Groups (NAGs), 1946–2001", pp. 720–734.
- 8.Kishore Gawande and Christopher Magee, "Free Riding and Protection for Sale", pp. 735–747.
- 9.James R. Hollyer and B. Peter Rosendorff, "Leadership Survival, Regime Typ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PTA Accession pp. 748–764."
- 10.Gary Uzonyi, Mark Souva and Sona N. Golder,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Signals", pp. 765–776.
- 11.Stephanie J. Rickard, "A Non-Tariff Protectionist Bias in Majoritarian Politics: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lectoral Institutions", pp. 777–785.
- 12.Lucy M. Goodhart and Anastasia Xenias, "Guns and Money in the Open Economy: The Exchange Rate and the Demand for Arms Imports", pp. 786–792.
- 13.Julia Gray and Philip B.K. Potter, "Trade and Volatility at the Core and Periphe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pp. 793–800.
- 14.Virginia Page Fortna and Reyko Huang, "Democratization after Civil War: A Brush-Clearing Exercise", pp. 801–808.
- 15.Alejandro Quiroz Flores, "A Competing Risks Model of War Termination and Leader Change", pp. 809–819.
- 16.Joe Weinberg, "Do Majoritarian Electoral Systems Favor Consumers: Identifying Cross-National Consumer Bias", pp. 820–826.
- 17.Mark A. Abdollahian, Travis G. Coan, Hana Oh and Birol A. Yesilada, "Dynamics of Cultural Change: The Hum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pp. 827–842.
- 18.Indra De Soysa and Paul Midford, "Enter The Drag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versus US Arms Transfers to Autocrats and Violators of Human Rights, 1989–2006", pp. 843–856.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7, No.2

- 1.Martin Gassebner, Michael J. Lamla, and James Raymond Vreeland, "Extreme Bounds of Democracy", pp. 171-197.
- 2.Michael Albertus and Oliver Kaplan, "Land Reform as a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Evidence from Colombia", pp. 198-231.
- 3.Tamir Sheafer and Shaul Shenhav, "Political Culture Congruenc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Revisiting the Congruence Hypothesis with Prospect Theory", pp. 232-257.
- 4.Douglas M. Gibler and Steven V. Miller, "Quick Victories?: Territory, Democracies, and Their Disputes", pp. 258-284.
- 5.Peter Liberman, "Retributive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Punishment and Torture", pp.285-306.
- 6.Eline Van der Heijden and Erling Moxnes, "Leading by Exampl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Do the Costs of Leading Matter?", pp. 307-326.

7. David Hugh-Jones and Ro'i Zultan, "Reput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Defense", pp. 327-35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0, No.1

1. Sophie Meunier, "The dog that did not bark: Anti-Americanism and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in Europe", pp. 1-25.

2. Emmanuel Frot and Javier Santiso,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portfolio managers in emerging economies", pp. 26-51.

3. Leonhard Dobusch and Sigrid Quack, "Framing standards, mobilizing users: Copyright versus fair use in transnational regulation", pp. 52-88.

4. H ne Pellerin and Beverley Mullings, "The 'Diaspora option', migration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pp. 89-120.

5. Anne Roemer-Mahler, "Business conflict and global politic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the glob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p. 121-152.

6. Ben Selwyn, "The global retail revolution, fruit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Brazil", pp. 153-179.

7. Miguel Otero-Iglesias and Federico Steinberg, "Reframing the euro vs. dollar debate through the perceptions of financial elites in key dollar-holding countries", pp. 180-214.

8. Valbona Muzaka, "Contradictions, frames and reproductions: The emergence of the WIPO Development Agenda", pp. 215-239.

Security Studies, Vol.22, No.1

1. Jakub Grygiel, "The Primacy of Premodern History", pp. 1-32.

2. 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unterfeit Diplomacy and Mobilization in Democracies", pp. 33-67.

3. Michelle Bentley, "War and/of Words: Constructing WMD in US Foreign Policy", pp. 68-97.

4. Giorgi Gvalia, David Siroky, Bidzina Lebanidze & Zurab Iashvili, "Thinking Outside the Bloc: Explaining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 pp. 98-131.

5. Michael Levi, "The Enduring Vulnerabilities of Oil Markets", pp. 132-138.

6. Eugene Gholz & Daryl G. Press, "Enduring Resilience: How Oil Markets Handle Disruptions", pp. 139-147.

World Politics, Vol.65, No.1

1. Eri Saikawa, "Policy Diffusion of Emission Standards Is There a Race to the Top?", pp. 1-33.

2. Daniel Yew Mao Lim and James Raymond Vreel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apanese Influence over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p. 34-72.

3. Kimberly J. Morgan, "Path Shift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Work-Family Policies in Western Europe", pp. 73-115.

4.Rahsaan Maxwell, "The Geographic Contex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mong Migrant-Origin Individuals in Europe", pp. 116-155.

5.Joshua Eastin and Aseem Prakas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Is There a Gender Kuznets Curve?", pp. 156-186.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9, No.1

1.Matthew Wats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Everyday IPE'", pp. 1-23.

2.Jean-François Drolet, "Nietzsche, Kant, the democratic state, and war", pp. 25-47.

3.Wanda Vrasti, "Universal but not truly 'global': governmentality,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pp. 49-69.

4.Steven Slaughter, "The prospects of deliberative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G20: legitimacy,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contestation", pp. 71-90.

5.Christine Cubitt, "Responsible reconstruction after war: meeting local needs for building peace", pp. 91-112.

6.Jeremy Moses, "Sovereignty as irresponsibility?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p. 113-135.

7.Mai'a K. Davis Cross, "Rethinking epistemic communities twenty years later", pp. 137-160.

8.Andreas Bieler, "The EU, Global Europe, and processe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transnational labour solidarity", pp. 161-183.

9.Ali Bilgic, "Towards a new 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actor responsibility in intersocietal conflicts", pp. 185-208.

10.Quddus Z. Snyder,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 liberal systemic theory and the mechanism of competition", pp. 209-231.

[整理: 刘芮宁 刘雨晨 石宇]

[责任编辑: 石宇]

读编往来

【编者按】自“读编往来”这个栏目在《新视界》诞生以来，编辑部收获了很多来自老师和学生的祝福与建议，小编也为大家的各种问题提供了解答。本期的“读编往来”主要针对大一至大三年级的本科生进行了一项反馈调查，具体了解大家喜欢系刊的哪些栏目，以及喜欢这些栏目的理由，反映读者心声，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编辑部进一步完善各栏目的设置。

“最受欢迎的栏目”评选结果前三名

第一名：“国关人物”

第二名：“他山之石”

第三名：“时事观察”

“国关人物”篇

匿名读者（2011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一个人就是一本，一位大师的学术经历就是属于他的那部书中最绚丽缤纷，也是最凝注了作者心血的一个章节，读之让人获益匪浅。对于国际政治系的学生来说，在课堂中了解到的知名学者毕竟有限，而且对于他们的主要研究方向与成果也知之甚少。“国关人物”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查漏补缺的平台，让我们初步了解到大师的研究精华，茶余饭后翻一翻可作为课外小知识以供回味，若是学习写作，碰上某位大师的思想

著作时，还可回头来查一查“国关人物”这个栏目，看是否有对应的学者介绍，以便自己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相关方面的知识。

匿名读者（2010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我本来比较喜欢“国关人物”，而且每期都看，但是后来感觉仅仅两三页纸的内容还不能展现出一个大师全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所以希望“国关人物”以后可以增加一些内容，也增加一点深度，或者摘录其代表性的文字，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位大师。

“他山之石”篇

匿名读者：（2010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他山之石的文章基本是“名师教法”，正是我们急需的，也是平时在课堂上不可多得的知识，更具有操作性和实用性。尤其是在上一期的该栏目中，介绍了米歇尔

教授的一篇关于理解学术写作的文章，很有意思，让人颇有收获。中国学者的方法介绍通俗易懂，而外国学者的“学术之路”虽然读起来有一些别扭和晦涩，却让你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你了解到学术前沿是什么样的。

匿名读者(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由于刚开始接触论文写作, 所以每次动笔都是捉襟见肘, 希望“他山之石”能够

提供给我们一些写作套路, 另外, 对于数据库的应用也很陌生, 希望能有详细介绍该类内容的文章。

“时事观察”篇

匿名读者(2010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老师总说, 要了解一国的外交政策, 最基本的是要先了解史实、事实。而我们平时学到的基本都是书本上的理论, 很少真正地关心时事, 更不用说对时事提出自己的评价或观点, 尤其是对于我们女生而言。所以每一期的“时事观察”我都要翻一翻, 看看周围的人对最近的国际动态持什么想法, 然后引发一些自己的思考, 也算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我特别喜欢年终刊的“时事盘点”栏

目, 就像是一个专门的新闻版块, 很有意思, 也能运用到别的地方。

匿名读者(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特别希望看到外国媒体对事件的报道, 英文摘录也可以, 这样就能让我们对事件有更加立体的了解。另外, 还希望多加入一些对欧美国家事件的报道分析, 不要总集中在亚太地区。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能够加入针对该问题的提问环节, 可以在下一期的栏目上公布解答。

小编总结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接受调查的本科生同学, 感谢你们能够提供宝贵的观点与建议, 支持系刊的工作, 而我们编辑部一定会根据大家的建议, 完善各个栏目的安排设置。几位小编认真而辛苦的调查和采访得出了以上成果, 但我们也了解到大家的偏好确实不一, 所持观点见仁见智, 比如大一年级的同学会很喜欢迎新特辑, 而一些想到国外交流

学习的同学就偏向于关注“暑期栏目信息”或者“海外国关人”这类栏目……

小编们在此很抱歉没能将大家的想法一一呈现出来, 但是我们一定会把所有的调查信息都反馈到编辑部, 然后根据意见汇总做出调整, 改进栏目设置或者不定期召开交流会, 为大家答疑解惑, 也使系刊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和监督我们的工作!

给我们写信吧!

把你想对我们说的话, 对我们改善栏目的建议, 以及希望得到我们解答的疑惑, 发给我们吧! 来信请发: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我们将尽可能迅速和详细地回答你的提问。

[整理: 李冰莹 于凯玥 郝丽君]

[责任编辑: 郝丽君]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 (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1 页。

2. 编著: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68 页。

3. 译著: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在文献名之后,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如为三人以上,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著者,文章题目(加书名号),文集编者名称,文集名,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 109-117 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 年 6 月 15-17 日,第 3 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 年 4 月,第 55 页。

(三) 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3 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 2006 年 2 月 12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 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60 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 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作者, 文章标题(加双引号), 文集编者, 文集名称(斜体), 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 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 作者, 文章标题(加双引号), 刊物名称(斜体), 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 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 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 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 其注释也应尽量

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 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4 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并提供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